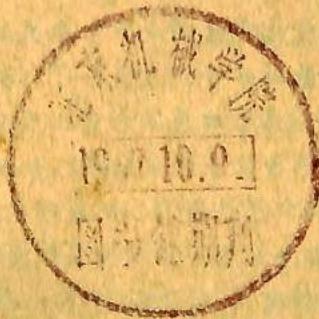


最 高 指 示

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彭 真 反 革 命 罪 恶 史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罪行录之二 ·



原北京市委、市人委机关摧旧兵团

1967.8.

前　　言

毛主席教导我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們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彭真就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彭真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成员，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党阀、大恶霸、大叛徒；是彭、罗、陆、楊反革命政变集团的元凶；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子；是刘、邓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急先锋；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他跟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地道道的老反革命。

就是这个家伙，早在二十年代就叛变革命，出卖同志，当了可耻的叛徒。

就是这个家伙，在抗日战争时期，伙同刘少奇，竭力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极力推行“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阶级投降主义，拼命推销并发展了王明路线。

就是这个家伙，在解放战争时期，与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狼狈为奸，猖狂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

就是这个家伙，解放以后，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旗下，与大军阀罗瑞卿、大学阀陆定一、大特务楊尚昆结成了彭、罗、陆、楊反革命政变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

就是这个家伙，解放以来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互相勾结，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赵凡等结成死党，结成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顽固地推行了一整套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北京市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市变成他們实行反革命政变的基地。

就是这个家伙，一九五七年配合资产阶级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是个漏网大右派；一九五九年又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猖狂向党进攻，是个漏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就是这个家伙，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伙同刘少奇、邓小平，加紧进行篡党、篡军、篡政的阴谋活动，四出活动，大肆搜集反对我們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子彈”，制造了惊心动魄的“暢观楼”反革命事件，妄图发动赫鲁晓夫式的“宫廷政变”。

就是这个家伙，疯狂地反对和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刁难和打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公然抗拒毛主席关于批判吳晗的伟大指示，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一手炮制了反革命的“二月提綱”；亲自策划了舍車馬、保將帥的“四、一六”政治大骗局；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包庇牛鬼蛇神，妄图扑灭毛主席亲

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总之，彭真自一九二三年混入革命队伍以來，一直坚持反动立场，伙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之流，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真是“决东海之波流恶不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历史，就是反对我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就是反对光耀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历史，就是追随刘少奇、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篡党、篡军、篡政，阴谋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一句话，就是反革命的罪恶史。我們怀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刻骨仇恨，把彭真的反革命罪恶史的一部分材料加以整理，公布于众，供革命的同志們批判参考。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讓我們牢記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彭真及其后台刘少奇、邓小平，彻底批深、批透，把他們斗倒、斗垮、斗臭，再踏上一只脚，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埋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让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耀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普照全中国，普照全世界！

彭真的反动家庭

一九〇二年，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党阀、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原名傅懋功）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反动富农家庭里。彭真从小就参加劳动，靠家中七、八十亩土地剥削上了中学。其父傅维山在清朝末年当过“公持”，国民党时期，摇身一变成了“间长”、“村编”、“村副”。傅维山仗着势力，欺压群众，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是当地一条恶棍、赖狗。其母魏桂芝是富农婆子，解放前后一直骑在人民头上过着寄生生活。彭真弟弟傅懋惠是个汉奸，早在解放初期，曾向彭真索取手枪两支，在乡村狐假虎威，专门吓唬贫下中农，仗彭真之势，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平时不劳动，花天酒地，大搞投机倒把。彭真的老婆张洁清是河北省霸县有名的大地主、伪县长张茧的女儿，是北洋军阀大买办张勋的孙女，生活上是十足的资产阶级阔太太。

彭真长期隐瞒其家庭历史，他口口声声说是“中农家庭”出身，有时又说是“农民家庭”出身，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富农。在这样的家庭及社会环境里，他的思想中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他的反动阶级立场一直没有得到改造。一九六一年，当国家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他回家探母，并暗示地、县两级哈巴狗给其母发了“工资”，按十级干部待遇进行付食供应。彭真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邀集兄弟姊妹，亲戚故友，带上陪同随行人员，浩浩荡荡，到富农分子、当地小绅士、他的父亲坟上祭奠，祭酒行

礼，颇为隆重。彭真不仅不负其父“支撑门户”的教导，而且实现了“光宗耀祖”的个人野心，真不愧是富农分子的孝子贤孙。

彭真在六一年和六四年中两次“衣锦还乡”，促使和支持省、地、县各级一小撮奴才们越加对其主子的老巢——坪上大队“精心栽培”，成了“坪上王国”，对贫下中农好干部大加迫害，对恶霸坏蛋加倍保护。六四年彭真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谈到其弟所干坏事时说：“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大事。不外是：不爱劳动；投机倒把；男女关系，没有犯下枪毙的罪，能改造好”。其目的就是要县委包庇其弟。难怪群众说：“官大压死人”，称为“彭霸天”。

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三年彭真在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他大搞政治投机活动，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纷纷参加革命的洪流，他投机革命，钻进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一九二五年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全国范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新高涨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当年夏天，彭真和高克谦等同志领导正太路石家庄机械厂赤色工会的“买米斗争”。由于彭真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开始就提出了“和平请愿”，结果斗争失败。敌人大肆逮捕，十几名工人积极分子被捕入狱，又到处搜捕运动的领导人。一日早晨，彭真正在门口，高克谦同志在屋子里写东西，三个警察突然闯来，问彭真：“这里有姓傅的吗？”彭真竟回答说：“不知道，我是找朋友的，你们到屋里看看”，说完就溜走了。彭真为了保全自己的一条狗命，他竟可耻地用计指使敌人逮捕了石家庄市地下党负责人高克谦同志。高克谦同志与敌人斗争，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了。不久，彭真又骗取了石家庄大兴纱厂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制造了工人队伍的分裂。他又是在形势紧张时，保命逃跑了。

一九二六年

彭真与王××在天津，以江湖游客卖艺练武为名，与青红帮、伪警察打得火热，搞封建式的磕头，拜把兄弟，进行所谓“地下工作”。后来彭真爬上了天津地委的领导职位，他贪生怕死，不敢出头露面。彭真竟无耻地不打自招地对工人群众说：“我是资产阶级，你们是工人阶级，我和你们不一样”，并在工人中间大肆贩卖机会主义的黑货，把老牌的机会主义分子布哈林捧作偶像来崇拜，号召工人读布哈林的什么《共产主义ABC》。工人们提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打倒资本家”的政治要求。彭真不但不予支持，而且百般地压制他们，胡说什么“中国还没有资本家，中国没有那个条件，只有美国才有资本家……”。彭真顽固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扼杀新生的工人运动。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六年

一九二七年

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了“四·一二”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在革命处于战略退却的低潮时期，本当改变斗争方式，注意保存实力，以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可是彭真这时却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掉进了“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泥坑。

九月底彭真在省委会议上，竭力贯彻大叛徒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拼命鼓吹武装暴动和“飞行集会”。结果导致“玉田暴动”失败，省委于方舟、司令杨春林等同志均遭杀害，许多农会瓦解，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失。

一九二八年

年初，彭真爬上了顺直省（现为河北省）省委组织部长的职位，并负责工会工作。六月彭真又窃取了代理书记的职务，在党内实行家长式统治，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造成省委内一片恐怖和混乱局面，四分五裂，工作不能进行。十二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上对彭真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判，罢了彭真的官，令其停职反省，彭真对此一直怀恨在心。

一九二九年

彭真窃踞天津地下党第三区委书记职务。六月彭真在天津被捕入狱，他贪生怕死，马上供出了自己真实姓名及党内职务，供出了前顺直省委组织秘密，并出卖了省委和工人多人。他还竟然在敌人法庭上公开暴露了郑昌烟草工厂工人郑××的身份，厚着脸皮向敌人表白自己说：早就“不干共产党了”。看！这就是彭真的真面目。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四、五十年的斗争史，是一个极为伟大极其壮丽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史。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被投入敌人的监狱。但是，无论是在敌人的屠刀下，还是在刑场上，无数共产党人经受了严刑和死亡的考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心红志坚，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为了革命，昂然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的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崇高的革命气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是千百万革命后来人的光辉榜样，是我们党和伟大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然而，在严酷的考验面前，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败类都一一变节投降了，成为可耻的叛徒。彭真这个政治投机分子，就是个代表。从他这次被捕入狱到一九三五年自首出狱，全然暴露了他苟且偷生，出卖革命同志，以及他的一套“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投降哲学”的货色。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叛徒。

一九三〇年

五月，蒋、冯、阎之战爆发，阎锡山在天津的统治出现新危机，这是对敌斗争的好机会，狱中一百多同志趁此机会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绝食斗争，彭真极力阻止。但趋于形势所迫，彭真才不得不表示同意。绝食后他又说什么：“条件提的太高了，难于取得胜利”。广大“政治犯”斗志昂扬，决心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绝食后的第三天，敌人为了分化、瓦解“政治犯”，将彭真等人从第三监狱转押陆军监狱。在陆军监狱，敌人继续施展其反革命攻心战术。由于彭真的叛徒嘴脸早已得到了敌人的赏识，敌人就利用这个作为陆军监狱“政治犯”代表的彭真，演出了一场卑鄙的政治骗局。在绝食斗争的第五天，伪警察局长曾延毅假惺惺地来到监狱“看望”，伪善地接受“政治犯”的复食条件，并送来“营养食品”“给犯人补养身体”。对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所玩弄的阴谋，彭真不仅不予以揭露斗争，反而感激涕零，欣然接受敌人的“赠品”，奴颜十足地连声说“谢谢局长，谢谢局长”。而且，他还死心踏地地同敌人合伙大搞政治交易，对敌人唯命是从，坐着曾延毅的小汽车从陆军监狱到第三监狱，到处游说，要正在进行绝食斗争的“政治犯”复食。当时，有部分人不同意复食，彭真竟然加以训斥地说：“斗争不要过渡，还得给曾延毅留点面子嘛！”彭真软硬兼施，连骗带吓，使这次绝食斗争停止下来。其结果呢，仅在生活上得到一点改善，陆军监狱“政治犯”要求回第三监狱都没有达到目的，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恶劣后果，是事后敌伪报纸借此大作反革命宣传说：“曾延毅亲自过问，并给食物，各犯感激”，云云。就这样，在叛徒彭真同敌人的一笔政治买卖背后，大力美化了反动派，恶毒丑化了狱中革命者，大长敌人的反动气焰，大灭革命群众的志气，从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于是，狱中广大同志又举行第二次绝食，向敌人再一次展开英勇的政治斗争，彭真竟胡说什么“监狱里的伙食已经能保证身体了，要努力保持现状，再搞绝食斗争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好好读点书，以后有用”。由于彭真叛变革命得到敌人称赞和优待。伪警察局长曾延毅说：“象傅茂功这样的人是很少有的”，比作“梁山宋江”。意为可以受蒋匪“招安”。

一九三一年

四月，彭真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转押到北平第二监狱。在火车上有人提出：为了保持天津第三监狱广大革命者艰苦斗争的一些果实，要一到北平第二监狱就进行绝食斗争。有的还提出：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打击敌人，一到车站就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对于这些建议，彭真都一一拒绝，并蛮横地指责这些都是什么“过左的举动”。

一九三二年

春天，同狱革命同志决定利用清明节趁大学生来监狱参观机会向当局宣布绝食，以揭露敌人和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于是监狱科长便威胁说：“你们要暴动，我报告当局去！”“调军警来镇压你们”。彭真被吓得跪地求饶说：“我们是绝食，不是暴动，你硬说我们是暴动，就给你跪下了”，还示意别人和他一起也跪下。

一九三五年

彭真自首出狱后，受刘少奇指使，化名老魏依托在大官僚、大汉奸、大地主张壁门下，进行“地下工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而蒋介石反动派却继续执行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政策，集中力量进攻北上抗日的红军，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在这时，毛主席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活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我党的领导下，北平一万多名学生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国大示威。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宋哲元军队）镇压，革命学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可是刘少奇、彭真却吓慌了手脚，彭真极力把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纳入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轨道，搞所谓的“合法斗争”，对国民党反动派卑躬屈膝，委曲求全，搞无条件的统一，不是把学生抗日运动引向前进，和工农结合，准备抗日的武装斗争，而是停留在知识分子中，搞什么夏令营等活动。不仅如此，彭真还鼓动学生向宋哲元的二十九路军献剑献旗，要这个勾结日本的反动军阀宋哲元来“领导抗战”，大肆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北方青年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刘少奇、彭真之流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事后他们却自我吹嘘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贪天之功，真不知耻辱。

彭真长期住在张家，和张家的女儿，资产阶级小姐张洁清鬼混，后与张洁清结了婚。张洁清多年来为彭真出谋划策，出力不小。

张家还仗依彭真权势和帮助，解放初期和一九五八年曾两次倒算回曾被没收的房产一百余间，牟取暴利三万余元。

一九三六年

处于抗日战争前夕，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正确领导，从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而蒋介石卖国贼却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极力想瓦解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我党许多优秀党员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而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代表的个人野心家刘少奇，为了他篡党篡政的需要，竟然适应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策划收买了一大批叛徒。彭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当时被刘少奇拉入北方局窃据了组织部长职务。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等同志怀疑彭真是特务、内奸，要对他进行审查。刘少奇心怀鬼胎，一手遮天说什么“我很了解他，我和他同过事，不用审查”，“彭真年轻有为，很有魄力，很能干，可以担任重大工作”。刘少奇包庇了彭真。彭真感恩不尽，就到处大肆吹捧刘少奇，极力为刘少奇往上爬拐骗选票。直到解放后彭真还说：“一个党的干部不仅会用人，还会选择党的领导人，如少奇在三六年还不被很多同志所了解，我看出来少奇是

个优秀的领导人，所以在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上，选举北方局书记时，我就在代表中做了许多工作，刘少奇才当选为北方局书记”。这就一语道破了彭真、刘少奇很早就结成了死党，狼狈为奸。

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

一九三七年

刘少奇回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安插彭真在北方局主持日常工作，并指定彭真为北方局代表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刘、彭一唱一合，围攻革命派，并串通张闻天、博古等背着毛主席制定了所谓《中央组织部关于自首分子的决定》，公然明文规定叛徒办了自首手续，填写反共自愿书的，还可以“恢复其组织”。他们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决定发到全党，把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一批叛徒包庇了下来。

一九三八年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开始了。由于我党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当时，彭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中，大肆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和党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绝对领导权”，竭力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彭真说：“国共两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任务”，并大肆美化国民党，恶毒地攻击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批评。他还提出要在“国民革命军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统一作战计划和军事指挥”，“在恢复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等等。

四月，彭真在晋察冀边区党代会上叫嚷：“在一切工作中都充分把握住‘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胡说什么在统一战线中“谁想领导谁也是不可能的”，咒骂我们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犯了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成了民族的罪人。”彭真拼命推行王明路线，受到了老机会主义者、老反革命刘少奇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赞扬。不久，刘少奇亲自写信给彭真，进一步鼓励他叛变革命的投降活动。彭真所传播的一条彻头彻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曾使晋察冀地区的工作在一度产生了束手束脚的倾向。使革命受到一些损失。

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以聂荣臻为代表的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许多同志的坚决反对，这些地区的工作很快得到扭转。

十月，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彭真参加了这次会议（聂荣臻同志未参加，留在敌后）。彭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份，第二次来到晋察冀，这次本来是传达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的，可是他在晋察冀分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竟然歪曲中央的决议，仍然推行王明路线。他继续鼓吹：“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大肆宣扬：“我们要竭诚地拥护蒋委员长”，“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胡

说什么“国民党的军队是英雄善战的中央军”，“改编红军是为的使其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就是说军队的独立自主性不要了，交给国民党蒋介石。）彭真竟然还诡秘地提出了我们党在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是：“1. 公平合理；2. 互助、互爱、互让；3. 减少摩擦分歧；4. 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并宣扬阶级调和，鼓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互助，地主与农民间互助”，“复巢之下无完卵，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在这里是完全平等的。”彭真竭力推行一条“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的投降主义路线，超王明路线。王明讲互助、互让，他还加了个互爱。

这年，河北文安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官××，策动我冀中独立二支队叛变，扣押了我军政委、参谋长、大队长等四十多名干部，送交日寇，惨遭杀害。我抗日军民义愤填膺，逮捕了杀人祸首××。彭真竟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精诚团结”为名，把这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交给了国民党。是可忍，孰不可忍？

同时，彭真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重用叛徒刘澜涛、李楚离、胡锡奎、黄敬、邓拓、宋邵文、王裴然等人。彭真大搞私人势力，大树个人威信，让邓拓（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在报纸上吹捧他，结果当时流传彭真是华北青年的“领袖”。彭真的狼子野心大暴露。

一九三九年

彭真从晋察冀到延安，把大叛徒邓拓也随身带去。彭真两次到晋察冀工作的前前后后合起来只有两年时间（抗战八年，他只占四分之一），可是他却窃取了晋察冀工作成绩的果实，散布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彭真一手创建的。”彭真到了延安以后，大吹牛皮，让邓拓炮制了洋洋万言的大毒草《关于晋察冀政策问题》的小册子。这里根本不讲军事斗争，却大肆吹捧刘少奇、彭真，为王明路线歌功颂德，正中刘少奇下怀，从此刘少奇赏识了大叛徒邓拓。

彭真的手伸得很长，他到延安后还经常越过晋察冀分局对冀中、冀东等地的工作横加干涉，继续推行王明路线。

当年，在刘少奇离开延安到新四军任职前夕，与彭真等共同策划了一个大阴谋，借我党在延安中央党校集训干部之机，把他手下的人大批留下或调入延安，参加党校集训，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一九四一年

秋季，彭真在晋察冀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略加修改，作为党内文件发表。这个洋洋十万余言的黑报告，疯狂地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全面地篡改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大肆贩卖投降主义的黑货。这个报告是刘少奇、彭真早期共同策划的一个反党黑纲领。

一九四二年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亲自发动了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审干运动。刘少奇、彭

真背着主席执行了形“左”实右的方针，把许多革命干部打成“反革命”、“特务”、“托派”、“叛徒”，却包庇保护了薄一波等真正的大叛徒。

趁整风之机，刘少奇、彭真合谋陷害一些了解他们底细并与他们作过坚决斗争的同志，同时策划以所谓“组织营救”的名义把大批叛徒、坏蛋庇护下来，没有受到审查。如对柯庆施、刘格平、韩培义等同志的残酷迫害，对薄一波、安子文、张秀岩等叛徒、坏蛋的包庇就是典型例子。

刘、彭合伙通过张秀岩（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张洁清的姑姑，其丈夫是大特务）诬陷柯老是国民党特务，将柯老关押两年，并逼得柯老的爱人投井自杀。解放后，张秀岩依仗彭真权势，逍遥法外，干尽坏事。彭真、安子文把她吹捧为“革命老人”，调到中央组织部长期供养，并安排为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延安中央党校，韩培义同志揭发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叛变问题，彭真、安子文串通一起，反诬韩培义是叛徒，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残酷斗争。二十多年来，对韩培义的政治迫害，从未间断，彭真一直亲自插手，进行威逼利诱。

一九四三年

二月，彭真窃据了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他目无毛主席（毛主席兼校长），大肆吹捧刘少奇是白区工作的“模范”等等，狂妄之极。

一九四四年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彭真（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按刘少奇的意图让薄一波、安子文开出一九三六年叛徒集团名单，刘少奇与彭真订攻守同盟，加以庇护，并策划在“七大”会议上将其一批叛徒安插在党政军重要领导岗位上。

同年八、九月，晋察冀分局召开高干会，在彭真的指使下拒不传达中央书记处指示，而且在这个会议上还用极不正常的手法打击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聂荣臻同志，拒不执行中央关于整训部队，壮大部队的指示，反而拼命搞“精兵简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才留下二十几个人，军区司令部也没剩下多少人，参谋长没事干，到冀东检查工作去了，结果抗日战争一到反攻的时候，完全措手不及，使革命事业遭受很大损失。

同年一月，毛主席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一封信，高度赞扬演现代剧是“旧剧革命划时代的开端”。彭真公然与毛主席大唱反调，他在延安平剧院中说：“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才能反映现代”，极力反对京剧改革。

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四月，我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在“七大”后，刘少奇篡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等职，他利用职权将大批叛徒重新拉入党内，并无视中央规定，把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廖鲁言等大叛徒拉入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书记处。

八月——十一月，刘少奇趁毛主席、周总理亲赴重庆谈判之机，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东北局势”。刘少奇认为东北是推行他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实现“篡位”的理想基地，于是派他的得力干将彭真、伍修权等爪牙、党羽，从延安飞往东北。彭真把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让位罗瑞卿。彭真当上了东北局第一书记。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变本加厉的推行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伟大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不搞阶级斗争。他竭力散布“东北农村彻底依附城市”的谬论，反对林彪同志，分散兵力、打土豪，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彭真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彭真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彭真却大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高岗、伍修权、吕正操、林枫等结成死党，恶毒攻击林彪同志。彭真在东北一年多时间内却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

一九四六年毛主席把彭真调出东北，林彪同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有效地实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这个正确方针，因而在三年以后的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取得了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七年

彭真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下负责政策研究室工作，大叛徒邓拓也担任了研究员。彭真伙同大叛徒薄一波、安子文、邓拓等大肆吹捧刘少奇，并散发“刘少奇语录”，积极为刘少奇篡党篡政作舆论准备。

当年彭真和刘少奇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实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宣传唯成分论，提出：“贫雇农坐天下”的口号，侵犯了中农利益，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并打击了工商业，破坏解放区的经济，同时助长乱打乱杀，杀死许多劳动人民。他们借整党之机大搞“搬石头”运动，打击了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直到四八年二月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发出后，才得到纠正。

一九四八年

五月刘少奇兼任华北局书记，彭真、薄一波、刘澜涛、黄敬等大叛徒也在华北局。此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任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彭真、刘仁本来是反革命的老搭档，解放前夕又进行了新的肮脏的政治交易，彭真亲笔给刘仁写信，拉拢，许愿；刘仁

则指使部下，在驻地墙上书写“彭真语录”，吹捧彭真。

北平解放前夕，彭真在刘少奇庇护下成为北平市委书记，于是彭真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织接收北平的班子。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

一九四九年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早在解放前夕，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就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出自他反动的阶级本能，每日每时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一月，彭真在良乡县城召开的一次北京市入城干部会上作报告，闭口不谈毛泽东思想，闭口不谈作毛主席的好学生，别有用心地大讲特讲“别看现在是年老的领导年轻的，年轻的一定要超过年老的。”矛头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

二月北平解放以后，彭真在其主子刘少奇的支持下，窃踞了北京市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工会主席等职务。

彭真利用职权，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打击排挤老干部的罪恶勾当，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安插赵振声（即李葆华，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组织部部长，刘仁、王鹤峰任组织部副部长，大叛徒邓拓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大叛徒徐冰任北京市副市长。在彭真的黑旗下，谭政文、张文松、崔月犁、项子明、陆禹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青云直上，窃踞要职。他还包庇网罗了赵凡、包克等一批叛徒安插到重要岗位，担任要职，叛徒包克，一九四七年被捕，出卖组织和同志，发表了极其恶毒的反共宣言，彭真却说：“包克在狱中表现不错，是模范党员，可以当副市长”。不久包克当上了市政府秘书长。在彭真包庇下为他的小姨子、反党分子张洁瑜（一九四七年白色恐怖时脱党，回地主婆家当姨太太）“接上了组织关系”，安插到市妇联工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彭真公然抗拒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极力兜售刘少奇的黑货，起草了“市委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决定”，还以讲解党纲党章为名，大肆放毒说：“咱们中国大工业还少，大家动手，中、大工厂要允许他（指资本家）剥削。”又说“城市工作主要不是运输，不是肃反，不是教育，而是发展生产”。在市工代会上他胡说：“工会的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抹煞阶级斗争。

刘少奇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各处奔走，回到北京后，三月十九日，彭真立即召开北京市干部会议，会上刘少奇大肆美化资产阶级，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毛主席对私

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刘少奇说：“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和资产阶级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今天资产阶级是进步的，不是反动的。”彭真便大肆吹捧刘少奇，贩卖黑货。彭真后在某野战军政策训练班的报告中说：“要使资本家为人民服务，单靠教育和强迫都是不行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赚钱。少奇同志在天津曾说现在剥削少了，应设法叫资本家多开工厂，所以进城之后先不要忙着发动工人……。”他又对市委干训班讲话时说：“应该使资本家有利可图……，资本家关门，对工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他在石景山发电厂的报告中还胡说“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工人阶级，是一个西瓜被资产阶级切了一刀，分成两半”。根据刘少奇的黑指示彭真还召开了资产阶级座谈会，搞了扶植私营工商业的黑报告。

六月，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著作发表后，彭真以布置全市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为名，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

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戏剧改革的题词“推陈出新”以后，彭真公开抗拒说：“四郎探母为什么不能演出，说那些戏反动，可是演来演去也没有阻止革命还是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专门把旧戏班子找到旧市委演出“贵妃醉酒”等旧戏，并猖狂地说：“这是有意演的，让反对演这些戏的人知道市委不赞成禁演这些戏”。

八月，彭真和刘少奇怕暴露大叛徒集团的内幕，紧急指示安子文，伙同公安局副局长大叛徒冯基平，接受敌伪时期有关逮捕审讯我地下工作人员的档案材料七百八十多案卷，其中涉及我党干部一千六百多人，严加封锁，包庇叛徒。

秋后，彭真伙同大叛徒邓拓亲自炮制北京郊区土改决定。彭真说：“大城市郊区和一般农村不一样，土地和民主人士、资本家关系较多，土地搞不好，容易引起这些人的震动。”因此，北京郊区实行了“和平土改”，经营地主、富农原耕地不动，地主的浮财也不动，对地富不搞面对面的斗争，公开包庇地富。北京某区召开斗争恶霸的群众大会，会上愤怒的群众打了恶霸，事后彭真以旧市委名义通报处分该区区委书记，破坏土改运动。彭真炮制“和平土改的经验”，经刘少奇批准，在全国大城市推广，流毒甚广。

一九五〇年

年初，中央决定在中央机关开展忠诚老实整风运动，以清理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并确定主要对象是国民党留用人员和地下党员。彭真在刘少奇的支持下，窃取了运动的领导权，主管运动的是刘少奇，彭真任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大叛徒安子文任党组副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龚子荣任办公室主任。彭真亲自授意北京由刘仁具体抓，指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项子明任总办公室主任。彭真、刘仁几次散布延安整风搞“左”了的谬论，强调这次运动主要靠本人坦白，不搞追查。在彭真的主持下，这次运动搞得很不彻底。

彭真按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指示，伙同安子文把他们的档案“借”去，销毁了其中大量有关背叛变节的档案。后来又派人到北京图书馆把他们在一九三六年伪《华北日报》上写的“反共启事”的字样都挖掉，妄想毁尸灭迹。

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合署办公后，彭真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伙同刘少奇、安子文，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以中央名义发出一个恢复党籍、处理脱党等历史问题的

规定，公开包庇坏人和叛徒。

与此同时，彭真极力为其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效劳。他大肆贩卖刘氏黑《修养》，宣扬反动的驯服工具论，说：“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们办党校就是要训练一批为人民服务的驯服工具”。

他紧跟刘少奇的调子，宣传“剥削有功”的反动谬论。刘少奇胡说什么“剥削是有功的，剥削范围越广，剥削工人越多，功劳越大。……没有剥削工人，工人会更痛苦”等等。彭真则说：“我现在还愿意让你（资本家）剥削一点剩余价值，允许资本家剥削一点，自觉地养活资本家。资本家赚了钱，心里喜欢，就愿意多拿钱买机器，开工厂。”一付十足的修正主义嘴脸！

毛主席指出：“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大唱反调。八月彭真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说：“……在老区，……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就越来越少了，那里没有什么反革命了，土地改革已完成了十多年来，它主要是处理群众内部的问题了。”

在这次会议上，彭真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动观点，叫嚣什么“所有的都要拿‘法’来办。”他说：“现在我们是全国性的政权了，敌人基本上已经打倒了，这样大的国家，所有事情就要拿法来办。共产党员拿法来办，非共产党员也要拿法来办。”公开把法律凌驾于党的政策之上，强调所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法律强制，不光强制反革命、二流子、挑皮捣蛋的，就是工人、农民、干部，什么人也好，违犯了法律就不行，就要强制。”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把专政的锋芒指向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一年

彭真窃据了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职位之后，充分利用这一条战线施展其反革命的伎俩。

一月，彭真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全盘抄袭了苏联的法律制度，完全听取苏联专家达里可夫的一套，提出要根据达里可夫的建议，各级检察机关只服从中央垂直领导，妄想把法律委员会凌驾于党政之上。

二月，彭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作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恶毒攻击人民政府“敌我不分，姑息养奸，遗害人民，简直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企图以极“左”的面目，掩盖他的右倾机会主义。

五月，彭真在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中提出“民主建政”的反动口号，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彭真还说：“土地改革完成的结果，……专制的农村变成了民主的农村，因此不仅为中国工业化准备了可靠的条件，并且为中国民主化奠定了巩固基础”，公开抹煞阶级斗争。

这一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首先在北京开展这一运动。毛主席十一月亲自派江青同志到市委听取汇报，帮助部署这一工作。但彭真这个大野心家，一开始就竭力推销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形“左”实有的错误路线，大搞逼供信。在市政府局长会议上，彭真硬性部署各局限期交

出“大老虎”的数字，逼着下边搞逼供信，造成了许多假老虎。彭真对下面报上来的“大老虎”，不经调查核实，随即上报中央，后来经查明，很多是假的。在彭真的指挥下，下面还出现了体罚现象，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却把这些现象完全归罪于下面的干部。

毛主席很快发现和纠正了彭真的错误路线。这时候，刘少奇又出面派彭真到上海、广州去搞“三反”、“五反”，彭真又借此捞取政治资本。

运动后期，彭真还大刮翻案风，为在运动中揪出的贪污分子翻案，进行包庇。彭真得意的说：“×××这样的人，要是在别人手里，是要枪毙的。”这个人在运动中丝毫没有触动。不少人民来信检举市公安局一些处长以上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特殊化等问题，被彭真等压下来，不作处理。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彭真公开违抗毛主席的指示。五月，毛主席指示：“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判处死刑，并迅速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公然抵制毛主席的指示说：“有血债的，为人民极端痛恨的……，不能都枪毙，有些可以关起来进行劳动改造，有一些可以管制，监视他们的工作，加以改造。”

一九五二年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样的思潮，总是想登台表演一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正是这样，在他窃取了北京市党政领导地位之后，大显身手地表演他的反革命演技了。这一年彭真兼任市长。这个反革命的野心家早就想篡夺北京市的政权，他曾对亲信说过：“我在晋察冀时遗憾的是没有兼政，是聂荣臻抓了，军队在他手里。”当上市长后，彭真又假惺惺地说：“我当面对主席说，不兼北京的职了。”当别人说“书记还是要兼，市长可以不当。”彭真马上露出狼子野心，说“市长活动范围可广了，国际国内，这个不能不当”。可见彭真紧紧抓住北京市这个独立王国，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

分配大学毕业生时，彭真伙同安子文利用职权，指使旧北京市委“动员”一部分党员“服从组织决定，主动申请不毕业，离校后由市委分配工作”，以便发展彭贼的黑势力。此事被周总理发现，并批评了他们。彭真很不满意，甚至嚣张地质问周总理“人事部门不公道……”。

十月，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召开了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彭真担任了党组书记。会后，彭真在全体工作干部会上总结这次会议时，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印度克什米尔（印和大主席）说最后那次会的执行主席（指彭真）是我平生以来见到的民主作风最好的主席。”有的外国代表喊彭真万岁，有的代表说“我们有这样的领袖就满意了”等等。事后，彭真专门布置旧市委收集反映，向中央写报告，为自己捞政治资本。

这一年，彭真散布了大量的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言论。他胡说什么“错误人人皆有，马克思、列宁、毛主席也不例外”，“毛主席的错误可用火车拉”；诬蔑毛主席“没有亲手分过一亩土地，也制定了全国的土地政策”。他还散布说：“主席工作是被动的，世界上的事，国际上发生的事，对主席来讲也是被动的”。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诬蔑和诽谤。

在对司法工作的所谓指示时，彭真公开号召大家学旧法，说：“司法干部要批判旧法，但旧法也有可以学的地方，《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都可以读一读。”

一九五三年

年初，郑天翔被彭由包头调来北京，提拔为市委秘书长。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彭真提名刘仁为第二书记。这一决定尚未下达，郑天翔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告诉他的部下项子明、王汉斌等人说：“这下市委领导问题解决了，这次中央讨论刘仁当市政协主席时，彭真提让刘仁当第二书记，中央已经通过了”。这完全暴露了他们结党营私的丑脸。

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审干工作。彭真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等慌了手脚，千方百计保护叛徒，规定“组织上了解的人不审查”，由刘澜涛开了个叛徒名单交给刘少奇完事。北京市的大小叛徒也被彭真借机一手包庇了下来。

夏，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批判薄一波的右倾机会主义。薄不服，而彭真却伙同刘少奇、安子文千方百计地为薄一波开脱罪责，并指使安子文给薄一波鼓气说：“少奇同志曾向主席和财经会议上的一些人讲过，薄一波的错误可以批判，但薄一波在监狱期间还是坚定的。”

九月，第二次全国组织会议期间，刘、彭、安合谋搞了一个有薄一波无林彪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名单，阴谋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排斥在外，被毛主席党中央制止，才未得逞。

九月，彭真在一次讲话中说：“镇反当作运动来说已基本结束。现在社会改革性的大运动已完成，进入了建设业务的阶段，要逐步地健全、运用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又说：“保护经济从两方面：一是与反革命作斗争，另是与人民内部的骗子、懒汉、流氓作斗争。从对国家资产的危害来说责任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并不比反革命的破坏轻些。”看！彭真一方面抹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责任事故”，即指向我们工厂、企业的广大职工。

这一年毛主席亲自制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国农村掀起了一个伟大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四月间，邓子恢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掀起了第一个反“冒进”高潮。这个会是根据刘少奇的旨意：“集中批判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批判了各地办社贪多贪大，不按群众运动的规律办事。”强调“照顾小农经济的落后现状，防止工作中的急躁倾向，迁就一下农民水平。”就在这次会议后，彭真在一次报告中讲“现在我们左的东西还不少，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得太快了，有强迫命令，凡是条件不成熟的就不能着急。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有准备、有把握，左的倾向不纠正，就会陷于被动”。又说“发展合作社就不能太急了。苏联那时也有过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所以我们组织农民，就要自愿，慢慢地达到一半，然后达到百分之六十、七十。”

一九五四年

七届四中全会上，毛主席要彭真检讨他在东北时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彭真先把他“检讨”给刘少奇看。刘少奇怕彭真过不了关，就给出谋划策，让彭真通过杨尚昆从中央办公厅取走了大批核心档案，由彭真的亲信邓拓、赵鹏飞、李琪、王汉斌等人帮忙

开了许多夜车精心炮制了一个假检讨，蒙混过关。

与此同时，彭真向他的亲信张苏、武新宇、李琪、邓拓、赵鹏飞等人说：“我在东北局的错误，毛主席给作了结论（方针性的错误，而不是路线性的错误）。彭真公然造谣，盗用毛主席的名义为他在东北时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进行翻案。

彭真在北京市委召开的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会上说：“毛主席说过：刘少奇说了些错话不算什么，谁没有错误？”又说“毛主席说过‘刘少奇的错误比他的错误少的多’”。在这里彭真又用造谣污蔑的手法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涂脂抹粉。

六月，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彭真亲自指定他的反党干将杨伯威，孙国梁炮制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相对抗，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纲领。这个“决定”鼓吹专家办学，考分挂帅。在全市中小学以至在全国流毒甚深，是彭真在教育方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暴露。

九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当上了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则同时爬上了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宝座，又窃据了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位。

于是，彭真利用职位，操纵、控制人大常委会，进行阴谋活动。他经常强调人大常委会是最高等权力机关，要对国务院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实行最高监督。首先对检察院、法院等专政机关加强控制。在一届一次人代大会上再次叫嚣“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说“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

人大常委除参加常委会议以外，本来没有什么“公”可办，可是人大常委会一成立，刘少奇彭真就搞了一个“三、六”办公，即每周三、六下午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到常委办公，以办公为名向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伸手抓权，拉拢资产阶级，为其篡党、篡政阴谋服务。

彭真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在刘少奇的指挥下，伙同李维汉、徐冰等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竭力鼓吹政协是“党总部”，“上议院”“要为政协的最高威信而奋斗”，明目张胆地为资产阶级争权夺利，妄图把政协变成刘、邓黑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九月底，赫鲁晓夫携布尔加宁和他的姘头福尔采娃访问中国。当时，彭真大肆吹捧赫鲁晓夫“是杰出的政治家”，“对中国估价极高，对中国热情友好”，“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开辟了中苏友好的新纪元”等等。彭真、刘仁亲自出面招待福尔采娃，同福尔采娃勾结。也是这个时候，苏修大使尤金找彭真要求解决苏大使馆新址的用地问题。尤金提出要旧俄国教堂，而当时旧俄国教堂已规划为开辟公园。彭真说：“研究一下”，尤金暴跳如雷，公然把中国的土地说成是俄国旧教堂买的地，叫嚷“把这块地给我们是完全应该的”，甚至说“过去（解放前）就是我们的”。彭真不予反驳，乖乖地答应了。

这一年，苏联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彭真在新侨饭店对三百多领导干部作一次报告，在这次报告中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吹嘘南斯拉夫，说：“斯大林对南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抗德意法西斯很英勇，是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靠自己力量打出来的，他在南斯拉夫人民中很有威信。斯

大林在外交上同南斯拉夫断交，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南斯拉夫受了很大的打击，仍然保持中立，没有倒向美帝国主义，是好样的。”这里，彭真完全充当了铁托的代言人，活画出一个投降主义的嘴脸。

一九五五年

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迅猛掀起。在这样的革命形势面前，彭真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一个模样，心慌意乱，怨天忧人，拼命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四月，邓子恢根据刘少奇的“停止发展坚决收缩”的黑指示，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黑司令刘少奇下令砍掉二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彭真则在北京作报告，发指示，紧跟刘少奇的步调，大砍合作社，破坏农业合作化。六月，彭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党代会的总结报告里，在郊区干部会议上，大讲特讲合作化办快了，起码半年之内停止发展，加以“整顿”，强调入社得有要求，退社也可以。七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了，这篇光辉著作给当时的所谓“反冒进”当头一棒喝。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特别指出，一些人对于新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这是错误的方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几次报告会上公然强调所谓“发展农业合作社不能超过农民觉悟水平。”他举例说：“譬如在这个报告会上，如果下令把大家的钢笔设法归我自己，大家一定不干，一定反对，所以不能这样做。”他竟然把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比作强行抢夺群众的财产，真是混蛋透顶。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前夕，彭真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充当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者，对资本家进行吹嘘、美化，抹煞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在一次北京市党员干部会议上，他说：“资本家越大越好。咱们中国就是这个样子。听话也是他们听话。”又说：“今天的资本家就更比较规矩了。至于唯利是图，偷点税、漏点税，那你就照顾点。他叫资本家，他的任务就是得利，他能偷点税还不偷点税，能漏点税还不漏点税。那个东西你搞什么，他总是要对付你。但总的来讲，这个阶级还是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的。”明目张胆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在同一会议上，彭真还叫嚷：“资本家现在变为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企业的人员和经理，积极性增加了。现除了四分之一的利润，那里还能唯利是图。如果企业变为社会主义的，他（资本家）还在企业中工作，那时，他（资本家）便变成国家工作人员。”“现在有好多资本家和我们公私合营了，有的变成我们的干部了，还不是与虎谋皮谋到了，不仅是与虎谋皮，连肉也谋来了。”“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同盟，其结果，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了工业品。”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明目张胆地美化资产阶级，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

彭真还当面对着资本家肉麻地吹捧。十二月，彭真邀请了二十多个资本家代表人物“座谈”，几个善于阿谀逢迎的资本家做了口是心非、故作姿态的发言之后，彭真肉麻地说：“大家反映的情况和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这说明是整个国家的进步，整个人民进步的一部分。工人进步，农民进步、工商界进步。”接着还说：“公私合营将来过渡到完全国有化，个人资本就没有了，但全国资产中有你的一份。到那个时候，你们所关心的生活出路和政治前途，无非是一个饭票问题，一个选票问题。用不着担心，毛主席有一份，你也有一份，我市长有一份，你也有一份。”大阴谋家、野心家彭真为了讨好资本家并抬高自己，竟敢把臭资本家和他自己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比，真是狗胆包天，狂妄之极！

在大肆美化资本家的同时，彭真还竭力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鸣冤叫屈。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报告中，说：“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不认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有些人没有把他们看成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现在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对他们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估计不足，对他们信任不够，安排使用不当；对他们的业务重视不够；待遇低等等。”

六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三日召开北京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彭真的一手操纵下，选出市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四十二人，几乎全是彭真、刘仁的亲信、党羽，包括大叛徒八人（除彭真外，有张友渔、冯基平、杨述、廖沫沙、陈鹏、胡锡奎、赵凡）。刘仁的城工部老班底竟占十六名。

旧北京市委成立书记处，彭真窃踞第一书记，刘仁爬上了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是郑天翔、范儒生、张友渔、陈鹏。统统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这时候，彭真抬出他的老婆为自己吹嘘。在一次汇报会上，彭的老婆张洁清说什么“一九四五年主席在重庆谈判，离开延安前曾让彭真代主席管中央的事。”妄图通过他老婆造谣惑众来抬高自己的威信，实现篡党篡国的罪恶目的。

当时，国务院法制局要编印人大、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法令和国务院发布的决议、命令和规定等，拟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请示彭真。彭借机大耍“委员长”的威风，横加批驳，说什么只有人大常委会才有立法权，他们制定的东西才能称作“法规”，汇编文件既然包括国务院的规定、决定等在内，怎么能叫“法规汇编”呢？有的同志据理反复作解释，彭真仍不同意。据说还是总理同彭真讲后，他才勉强同意用“法规汇编”这一名称。这里充分表现了彭真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不择手段地从各方面来达到他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目的。

在北京市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彭真极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减轻罪责，说：“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就是因为农民要土地，他不给农民土地。”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说：“毛主席和陈独秀的区别，在于他有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张分给农民土地。”

这年夏天，彭真的老婆张洁清大摆家宴招待苏修大使尤金夫妇，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夫妇，以及印度大使尼赫鲁（印总理尼赫鲁的侄子）夫妇。招待得非常阔绰。尼赫鲁吃完后大发感慨说：“来北京几年了，这一次解了福。”

一九五六年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但是国内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复杂。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这时候又从修正主义的垃圾箱里，拣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破烂，叫卖不止。他竟然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同资产阶级穿一条裤子”，建立了“同志关系”，达到了“披肝沥胆”的程度。

一月，彭真在天安门上“讲话”说：“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国家富强，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并且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春天，在和平宾馆，彭真对资本家说：“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了，不称你们先生了，我们都是同志了。”

在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彭真说：“地主富农奉公守法，资产阶级接受改造了，反革命也比过去老实些。因此，才搞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四、五条。城市里也想仿照搞个东西。”

在全国检查工作会议上，彭真说：“资产阶级交出了财产，解除了武装，地主富农也解除了武装，反革命分子经过去年镇反也进一步分化了。……现在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也不在这里，（注：指阶级斗争），而是在积肥、打井、搞生产。”

在一次会议上，彭真叫嚷：“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问题解决了再搞一下肃反，把北京搞的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样。然后集中力量搞生产、学习、工作。”

在另一次会上，彭真宣扬：“五亿多农民组织起来了，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不但地主富农不好搞破坏，反革命也不好搞了。这就挖掘了各种反革命的根……我们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胜负基本解决了。”

十二月，彭真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改造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同资本家基本上打了两仗——‘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打了这两仗后，生产关系改变了。……‘三反’、‘五反’把资本家的威风打下来了，……另一仗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同资本家的仗基本打完了，国有化容易办了。这两仗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因为合营后，资本家除了拿利息外没有别的了。”又说：“同资本家的思想斗争将是长期的，困难的，主要的斗争是评薪、劝资本家‘共产’，主要的方式是教育、克服困难、合营是斗争。合营后使资本家很好地进行工作，采取社会主义管理方法，是一系列斗争，但总的方式是和平的，和缓的。”等等，又一次大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九月，中央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彭真与刘少奇狼狈为奸，大搞阴谋活动，安插亲信，极力想把大叛徒邓拓拉入中央委员会。彭真自己则窃据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要职。由于没有选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毛主席怀恨在心。

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是刘、邓、彭合谋策划的。其中“国家的政治生活”部分是彭真起草的。这个报告竭力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阶级

斗争熄灭论，宣传阶级合作。他们根本没有经过毛主席，就擅自通过了。

会议期间，彭与刘接触频繁、上窜下跳、大肆活动。他同大叛徒安子文掌管选举中央委员会的事宜，乘机安插刘少奇的亲信为中央委员，他们还阴谋把林彪同志排挤出中央领导。会议之后，杨尚昆担任了中央候补书记的要职，彭真和杨尚昆结成死党，关系密切、专机联系。彭真又假借中央书记处工作忙，让罗瑞卿负责政法工作。杨尚昆在刘、彭、罗的庇护下，长期以来，背着毛主席和中央偷搞秘密录音，偷录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的讲话、窃听党的核心机密，为彭、陆、罗、杨反革命政变集团提供情报。尤其难以令人容忍的是，杨尚昆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竟然把阶级敌人使用的无线电窃听器，安设在毛主席的身边，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

这一年的二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在大反斯大林的狂叫声中、现代修正主义祖师爷赫鲁晓夫上台。

苏修二十大之后，刘、邓借反对个人迷信为名、大反毛主席，彭真更是为虎作伥。一方面吹捧说：“赫鲁晓夫有很大的成绩，过去苏联把斯大林捧的成神，现在赫鲁晓夫由神变成人”。一方面阴谋地散布，“中国党要吸取教训，不要再突出个人了，不要喊活着的人万岁了。”叫嚣“有人看一个人象太阳一样亮、太阳还有斑点呢！”甚至歇斯底里大发作说：“我今后不管你是谁，我都不迷信，要独立思考”。“主席的话不一定是结论，这里边有道理，我们可以研究。”

冬，彭真组织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东欧六国，借机大搞叛国活动。访苏时，彭真向赫鲁晓夫献媚说：“我们很喜欢你，我们是少年队，年青人见到老年人总是很欢喜的。”又说：“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苏联学习，别处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的结果，十月革命是干，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枝、叶。”访问南斯拉夫时，彭真瞒着中央和毛主席，踢开翻译和随员由他的死党伍修权（当时伍是驻南大使）任翻译，亲自和铁托密谈。铁托、彭真、伍修权三人合影留念”。事后彭真还把合影拿到某人面前炫耀，又作贼心虚，叮嘱看过照片的人“不要往外讲”。这是彭真勾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国家里通外国的罪证。

访问六国期间，彭真专门搜集了很多关于议会如何监督政府、如何搞各种常设委员会的经验。他们走访苏、南、保、捷等修正主义国家，极尽吹捧之能事，而对阿尔巴尼亚却要了一阵大国沙文主义的威风。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

一九五七年

二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在毛主席这一重要讲话的光辉思想指导下，开展了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整风反右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彭真出自反革命的本性，进行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破坏活动。他积极带头向党进攻，阴谋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以达到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罪恶目的。事实证明，彭真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漏网大右派。

四月二十日，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前夕，彭真为了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出”，跳了出来，打着“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为幌子，大肆推销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对毛主席划时代的光辉著作，进行了最无耻的歪曲和最恶毒的攻击。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把我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伟大方针曲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号召“放”，号召“乱”，号召用“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来反对党的所谓“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是他鼓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动员令。

整风运动开展的前夕，彭真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

四月二十三日，彭真召开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会上，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说：“过去讲党课把党的光荣、伟大、正确说的太多了，以后要多给他们讲些共产党里乌七八糟的东西和非马列主义的东西。”

同一时期，召开了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彭真在会议上作报告，鼓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说：“有的人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却怕人民闹事，一听人民闹事就吓得浑身发抖。就像有的人见了蜈蚣和小虫就害怕，就浑身发麻一样。应该见罢工、罢课就欢迎，象广东人见了蛇一样。”“过去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进行思想改造，是不对的。对潘光旦就过份了。北京大学教授傅鹰批评我很厉害，过去对他也太急了，有点尖酸刻薄，人家确实是爱国知识分子。”事后，还把这个大右派作为标兵。

四月底，彭真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他肆无忌惮地煽动说：“你们不要把共产党太理想化了，贪污盗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你整我，我整你，闹级别待遇，享受在前，吃苦在后，处处不起模范作用，等等，黑暗的东西在共产党里都有。凡是在国民党里能找到的，在共产党里都可以找。”

经彭真这一鼓动，一群名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嚣张了，纷纷表示“解除了顾虑”。有的说：“过去认为共产党是完整无缺的，听了彭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我启发很大”。有的在会下发表感慨：“参加座谈会很兴奋，本来我想发言，后来因为彭真的讲话正是我要说的话，才未发言。”就是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整风风潮中，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急先锋。

五月，乌云弥漫，右派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毛主席作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的重要讲话，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还说：“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彭真公然与毛主席大唱反调，顽固地站在

反动的立场上赞扬右派的进攻，他说：“必须肯定，人家批评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这是一付良药。”极力称赞右派进攻“不管立场如何”是“健康的”，“对！好！”“触动了我们（指党）。”叫嚷：“不如此，宗派主义整不下去；”叫嚣右派“暴风雨式”的进攻“是自己造成的”。

反右派运动之前，黑帮头子彭真及其干将张苏、武新宇等，同资产阶级右派一起，在人大常委猖狂向党进攻，和大右派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相呼应，要在人大常委设立“八大委员会，地方人大也设常委会，要对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地方党政机关实行最高监督”。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击右派的号角。这时，彭真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转入地下，为右派通风报信，千方百计保护他们过关。当时，一方面彭真伙同其得力助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崔月犁、宋硕乘小汽车到各高等学校找一些“知名”的资产阶级教授打招呼，给他们交底，暗示他们不要再放出来；另一方面，给学校划框框，定调子，竭力阻挠学校把一些反动气焰嚣张的资产阶级教授划为右派分子。

在旧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彭真攻击毛主席说：“有人说十五年来，创作界为教条主义所统治，没有好的作品，没有好的作家，十五年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来的十五年，这期间没有好的作品，没有好的作家，大家可以研究，我不愿武断，不愿批评。”六月，彭真在旧市委高干会议上叫嚣什么：“要知道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要说有，就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斯大林自以为永远正确，绝对正确，结果被苏共二十大一巴掌打得灰溜溜的，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把斯大林的像片摘下来了，甚至撕毁了。……可见，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恶毒影射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十月，又在人大、政协常委联席会上，彭真借右派分子之口，大肆攻击毛主席和周总理，说什么：“中央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包括毛主席、周总理也不怎么对。”在一次报告中，彭真还煽动“群众有什么意见，发表什么意见。对你教授就不能贴大字报？对毛主席都可以贴大字报”。疯狂至极，罪该万死。

九月，彭真在旧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胡说什么“我党的历史上前后有八家，就是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王明，但其余七家不愿对垒，党内搞不起百家争鸣。”极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抹煞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一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到河北、河南、湖北、广东、上海等地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彭真也紧紧配合大放厥词说：“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内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现在没有人讲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敌人了。”“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政治、思想上‘基本完成’。”

一九五八年

经过一场激烈的反右斗争之后，一小撮右派分子被揪出来了，这是一股凶恶的阶级敌人，正如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必须打倒，可是彭真与

毛主席唱反调，说什么“对右派要治病救人，与人为善，要一看二帮，不把他们当敌人看待”。又安慰右派分子说：“大家思想负担不要过重嘛！譬如街上走路，有的人在左侧走，有的人在右边走。左派在左边走，右派在右边走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关系，竟被彭真说成是“左侧走”“右边走”，真他妈的胡说八道！

反右斗争运动的后期，彭真加紧散布他那一贯坚持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他的“整风和红与专问题的报告”中说：“这次（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可说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一次，以后的波浪会一浪比一浪低，最后波动不起来。所以，可以说，去年这一斗争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斗争。”早几天他又重弹老调：“要把北京市搞的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样，没有不劳动的人，没有靠剥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扫干净，当然，反革命也不能有。”

于是彭真批准罗瑞卿在公安、政法工作中开展“十无运动”；李维汉、徐冰在统战部搞“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运动。要求北京在“十无运动”中做出成绩，把五类分子搞得干干净净，像玻璃板那样透明。

彭真借谈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毛主席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主席的错误可用火车拉，”何等猖狂！

在旧市委扩大会议上，又污蔑攻击毛主席说：“少奇同志说：主席也是党的驯服工具嘛，看怎么利用他更合适。”多么狂妄！

毛主席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彭真在旧市委曾说：“我不是不能搞理论，我也是能搞理论的；但是中央的许多工作总得有人做。”竟把自己同毛主席相比，狼子野心暴露无遗。

彭真伙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指示其手下黑干将邓拓、杨述、胡锡奎等，组织编写《北京地下党史》、《一二九运动史》，为刘、彭等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彭真大叫大嚷什么“一二九运动”是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一二九”时期，我们没有中央的领导，不也成功了？妄图借机抹杀遵义会议上确立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主席在党中央的绝对威信，其用心何其毒也！

彭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突出北京，抬高自己，炮制了一个假典型——天桥商场。彭真对他手下干将们说：“中央要抓商业工作，你们要赶紧行动，要走在前面。这个点只许搞好，不许搞坏，这个点搞好，也就突出北京了。”制造了这个假典型以后，彭真紧跟着大造气氛，“学天桥、赶天桥”之风顿时遍及全国。以后又把周总理和胡志明主席骗到天桥商场去参观。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彭真的老底，天桥商场是个假典型，彭真企图通过这个样板，在商业部门复辟资本主义。

彭真又乘我国开展对日工作之机，以他个人名义先后邀请了近二百名日本人，这些人多是市长、议员等政客，同时也是资本家，完全是为他的反革命变政服务。

经过整风反右运动，我国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这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亿万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对大跃进恨得要命，要起了

他的反革命两手，对大跃进疯狂地进行破坏。

一方面彭真借这个机会，大搞浮夸风。

八月至十月，彭真先后三次在天坛召开农业、工业、建筑业的万人大会，大搞浮夸风，大压高指标。对指标低的，骂做是龟兔赛跑中的乌龟。在农业的大会上，鼓吹亩产万斤，强行要郊区各区县委书记当场表态，其中有一个县委书记表示，只能亩产一、二十斤，彭真当即蛮横地说：“不要一、二、三，要四、五、六（即亩产四千，五千、六千斤）”。

另一方面，彭真对大跃进大泼冷水。有一次，他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反映四川稻田高产的照片，说：“这是弄虚作假，瞎吹牛”。彭真多次攻击大跃进是“感情代替政策，灵机一动就完了，没有底。”还说“五分成绩讲十分的总要栽大斤斗”，“不要吹牛，落后就落后，不要贪名，首都不能像徐水，到处去吹”。彭真在《前线》发刊词中，更加恶毒地攻击大跃进，在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纲领上，疯狂叫喊说什么“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事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还说什么不按他的这套办，就会“变成一句豪迈的空话，变成尾巴主义。”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纲领上用了像“俨然以世界主宰自居，对群众运动妄自尊大的审判……”等等词句，恶毒地影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这年秋天，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连续五天到石钢、石电，推行他的“企业自治”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还狂叫“不要怕和南斯拉夫一样”，彭、刘（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此心领神会，如获至宝。并通过他们把持的宣传工具，大肆吹捧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纲领是“企业管理的方向”，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于是发消息、写社论、登照片连续狂热吹捧达半月之久，并在石钢召开了全国性现场会，流毒全国。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工业上还策划建设北京市的“完整工业体系”，曾两次给中央写报告要求建设年产×××万吨以上的钢铁工业，和建设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重型机械厂。彭真扬言：“要把北京工业搞得像个样子要和首都的地位相称。”根据这个黑指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北京大搞工业基本建设，把大量的设备投资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破坏了全国工业布局。

也是在这一年，刘邓黑司令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邓拓、陈克寒塞进了旧北京市委书记处，从此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又增加了三员干将。内中的万里，是邓小平的亲信，早在一九四九年邓小平任西南局书记期间，万里为西南局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一九五二年随邓小平来中央建工部当付部长，一九五五年又被提拔为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到旧北京市委以后，上窜下跳于邓小平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之间，干尽了坏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反党杂志《前线》出笼，发刊词是彭真亲手炮制的一个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党活动的黑纲领。

十二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指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锡奎、陆平组织了

一个拥有一百六十三人的庞大的“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进行了为时七个月的“调查”，大肆搜集所谓“阴暗面”材料，妄图全面否定三面红旗，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一九五九年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指出：“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們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再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的工作方法，坚持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我們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在今后，我們將沿着这一光荣的胜利的道路，勇往直前，为新的伟大的胜利而奋斗。”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迎合帝修反的需要，和国内外阶级敌人一起跑了出来，疯狂地咒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疯狂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就是其中一个。彭真是一个漏网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一月，彭真在一次讲话中说：“要政治挂帅，……没有业务和技术，帅也挂不起，不要以政治代替业务。”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

三月彭真妄想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一次市委书记处会上要我们“对四类分子要王道，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帝王总是讲王道的。”这一年还开了一次政法会议。在会上彭真指示说：“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下令将“公安、检察、法院三个机关合并”。因而有的区县政法三机关已合并办公，严重地影响对敌人的专政工作的开展。

四月九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对郊区人民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讲话中，用尽人间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说：“有些人当皇帝当惯了，跟人家这样、那样，自己又没经验，事情就办坏了，……乱下命令，这不是共产党作风，是国民党作风，你就给他顶回去”。

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关于“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和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的重要指示。彭真在传达这一指示时，公然对抗毛主席说：“谁吃亏，谁占便宜，不要算了，算得脸红脖子粗，也算不清”，“俗话说：‘两人喝酒越喝越厚道，赌博，越赌越薄，越算账，越伤和气’”。

在准备国庆十周年献礼时，彭真狂吠“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形式多得很，比如话剧、电影都可以，何必勉强京剧演现代戏呢？京剧还是演历史剧好看，能发挥演员的唱、做、念、打的技术。以后京剧还是演历史剧吧！不要勉强表现现代生活了，连评剧也不要光演现代戏，评剧也有不少传统戏，好好翻翻箱底嘛！”

五月，彭真借视察之机，在鞍山的一次讲话中诬蔑大跃进“出了许多笑话，多得很，说不定编一部几百万字的《笑林广记》都可以”，妄图一笔勾销大跃进的伟大成绩。

六月，彭真指使反共老手“三家村”黑店干将吴晗、廖沫沙分别在《人民日报》和《前线》抛出《海瑞骂皇帝》和《要学会算账》大毒草，竭力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进攻。

八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上，彭真和刘少奇一唱一合，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借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叫嚷“不要喊个人万岁”。他们还批发安子文炮制的《关于一部分公社党委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方面的情况简报》给全党，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相呼应。这个简报是安子文根据刘少奇、彭真的旨意组织工作组到全国各地收集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主席的“材料”拼凑而成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革命政变集团头子彭真还没有彻底暴露，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跳了出来。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及时地识破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号召：“現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猖狂进攻。彭真伪装积极，藏了起来。彭真就是一个漏网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结束后，漏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真狗胆包天，胆敢出来替彭德怀喊冤叫屈。彭真刚从庐山回到北京，就吹捧彭德怀在民主革命阶段是什么“坚决的”。在怀仁堂向干部传达彭德怀的错误时，竟说彭德怀是“昨日忠臣、今日祸首”。彭真还胡说什么“反党与叛党还有区别，反党还没有造反，没有叛变，所以还是内部矛盾”。彭真和刘少奇勾结，把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黄克诚送中央高级党校“修养”后，又把彭德怀调西南委以重任。反党分子吴冷西回到北京后，写了个假检讨，彭真在假检讨上批示：“不再追究”，包庇吴冷西。彭真还得意忘形地说什么“在会上（指庐山会议）有四个小秀才（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胡绳、田家英、胡乔木）也同意彭德怀的观点，因为我说他们是认识问题，所以没有批判”。在庐山会议上包庇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自以为有功，大肆宣扬，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彭真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

这年，彭真还恶毒地散布谣言：“毛主席老了，毛主席说：‘工作由你们作，有需要我出来，告诉我，我可以给你们跑龙套’”。疯狂地攻击毛主席，迫不及待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夺党和国家大权制造舆论。

九月十七日，彭真在北京市人代会三届二次会议上说什么：“毛主席在各党派会上讲，古人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是说除圣人以外，都是有过的。毛主席说这句话也不对，圣人也有过嘛！”公然攻击当代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有过”，真是狗胆包天。

在刘少奇窃踞了国家主席职位以后，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伙同彭真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吴冷西、胡乔木盗用中央名义，下令全国报纸刊登刘少奇的狗象，同毛主席象并列，并且刘少奇的狗象要和毛主席的象同样大小，肩一样齐，妄图贬低毛主席，抬高刘少奇。彭真还狂妄叫嚣“毛主席年岁大了，今后要专搞理论工作，党和国家的大事要由刘少奇管。”

彭真还在北京市人代会三届二次会议上煽动人代会代表反对大跃进，胡说什么：“有人怀疑大跃进，当然你怀疑是可以的。”

这一年，彭真借别人之口又继续攻击三面红旗，说什么“湖南省有人讲，大跃进是白天白干，黑夜黑干，象公公摸媳儿妇一样”，“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在一年一次

的北京市工业会议上，讲话说：“《前线》发刊词讲不要当风筝，不要当氢气球，要实事求是，不要凭空办事。你看你们的厂能出产多少是多少嘛！为什么要凭空办事呢？”“本来原料、材料和设备力量，只能搞八个工厂，可是一下子搞十八个，结果都不能投入生产，这个好么？快么？省么？都不能投入生产，还有什么好、快、省呢？”又说大家到处跑材料，唯恐鞋子跑不烂，大车装不满，……坐在工厂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你按那个布置的摊子办，又拿不到材料，不按那个又不行。”“去年农业鼓气是放了一次空炮。这个我们鼓的是为了鼓深翻，鼓底肥，鼓密植。”“至于棉花没那么多，原来没有，你说是有，自己空喜欢。原来钢材没那么多，印那么些蓝票，那样实际上脑子记昏了，有一部分是主观的。”

在北京市人代会三届二次会议上彭真还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都参加劳动了，“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地大家一块就变了”，“阶级消灭就是这么个消灭法”，“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了，那么人的心情就舒畅了，那么也就容易改造了。”这一年他还说过：“现在资本家对改造是厌烦了，对资产阶级分子接受改造这么多年了，在企业要当自己人……做事一样奖励”，“对知识分子斗争，还要争取一切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批判可少些，已经批了一年了，现在可以打打扑克，看看电影了，要团结争取他们做出成绩，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有信心，学校可搞三结合。”还说：“现在否认党的领导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党让人家放手鸣放不够，不让人家有什么都讲出来，……进城后，和民主党派共事七、八年了，老朋友了，应该互相信任，不要还想在中间隔一堵墙。”

彭真伙同周扬、夏衍等把电影《青春之歌》定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这部大毒草，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按照刘少奇的旨意，互相勾结，一手策划摄制的。从剧本一直到影片的摄制过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刘仁、邓拓、陈克寒、周扬、林默涵、夏衍、陈荒煤等人精心炮制，多人修改，多次审批。出笼前，彭真曾带领旧市委、部、局以上人员进行所谓审查。影片歪曲历史，抹煞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宣扬刘少奇、彭真的白区工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宣扬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反对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的道路，鼓吹阶级调和，对青年进行腐蚀、毒害。

国庆十周年前夕，大野心家彭真指使大叛徒邓拓、黑帮分子李琪、杨述等人编印北京画册。这本画册，狂热地吹捧刘少奇，千方百计突出自己，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鼓吹技术挂帅，物质刺激，把文艺界的牛鬼蛇神都搬上了画册，宣扬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十月二十日，大党阀彭真辱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他的一次讲话中借别人之口，大骂：“有的对党委领导也说怪话，说‘党什么都管，管得太宽’。黑龙江省有人说‘与党在一锅吃饭不香’。”

这一年秋，彭真在人大常委会上说：“赫鲁晓夫替苏联解决了粮食问题，有功于国家”，公开替赫秃子吹嘘，真是混蛋！

反党头子彭真，对敢于向旧市委反党集团作斗争的革命同志进行打击陷害，周仁同志（原为北京东城区委书记）曾在一九五六年，市党代会上对旧市委不抓党的工作，不

务正业，提出批评。并说：政权建在沙滩上等。黑帮干将向彭真汇报了此情况，并提出周仁同志不能当八大代表。彭真说：“你们这样提不策略，你应该让我首先说，我拥护周仁当代表，然后再揭发周仁的问题，提出批评不就没人选了吗？”一九五九年，整周仁同志时，把前市委黑帮干将刘涌派到东城区任第一书记，而彭真说：“这样搞太露马脚了”，于是把刘涌撤回，让黑帮干将刘涌、余涤清、苏一夫等到东城坐镇，指示区委黑帮魏彬等整周仁同志，最后彭真以周仁同志是疯子为“理由”贬到丰台当付区长。

一九六〇年

彭真，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二月四日旧团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彭真看了会议简报后说：“给毛著打分，谁说是最伟大的，好像我们在那里争地位，教师还要看着作业才打分呢！”“谁第一，让别人去说，作业还没有做完，还在写嘛！”他还恶狠狠地说“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理论，应当讨论。”

彭真在二月二十九日的旧北京市委常委会上的讲话，恶毒地诬蔑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说：“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都是毛泽东思想，写了一篇文章都是毛泽东思想，容易庸俗，到处贴标签。不要名‘浮’其实，要名符其实，有实无名不要紧，只要我们的事业前进了就行了，不要追求虚名。”又攻击说：“理论学习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资本论》，怎么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呀！帝国主义，列宁已经讲过了嘛，无需再论了吧！”“毛泽东思想不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他们是不同时代，是接力赛。”还别有用心地说：“我们不要宣传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高峰，是不是高峰，是不是伟大，不能自封。”彭真在北京团市委书记处会上的讲话中说：“学马列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提法不科学。”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人民群众热烈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各个大专院校广大革命师生纷纷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然而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千方百计地破坏，借口大抓劳逸结合，大肆宣扬“一切以热量为转移”，“一切按定量办事”，叫嚷“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强迫命令”，并诬蔑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违反了自愿原则”。正在蓬勃发展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被他们镇压下去了。各个学校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被迫解散了。仅北京大学一校，就被解散了一千多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他们更加恶毒地诬蔑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说：“随便什么都加一个大名，毛泽东思想，犹如江湖药”“不求实效”，到处“贴商标”，“处处都以毛泽东思想作招牌。”等等。并千方百计地扣压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

三月，彭真在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党员大会上说：“……浮夸，有时中央考虑不符合实际，如粮食钢铁，指示……”又说：“社会主义建设里把劲鼓起来起好作用，但有些办不到，起坏作用。”彭真攻击大跃进，说大跃进浮夸，浪费人力。

三月，党中央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及时纠正共产风，指示各省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检查共产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胡说“北京郊区共产风已经解决了”，不打算

开会，后来为了应付中央，开了会，会上抗拒中央指示，继续大刮共产风，结果使这一年粮食产量大减。

三——四月，彭真找一些家在冀中、北岳区的人，叫他们回家了解农业生产情况，粮食供给情况怎样？彭真说：“光在北京看不到全国情况，北京郊区算得什么农村？要到河北看看，才能真正了解农业情况。于是黑帮分子范瑾、新华社记者崔永国等去定县，光极县一带了解情况，市委还组织了一些人到阜平、定县。这是彭真阴谋搜集反党情况的罪恶活动。

四月，彭真在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说什么：“资产阶级目前主要是跟不上形势，但愿意跟上来，这就对了。”“他们能跟着形势走，就算上轨道，挂在我门火车头上，走我们的路。”并“指示”“现在不要搞大的运动，还是搞和风细雨，搞神仙会”，美化资产阶级，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攻击诬蔑毛主席，胡说“老实讲吃的问题，共产党是不懂的。毛主席、总理都不懂吃的问题”，彭真听了后说“这些怪话可以不去管它，陈××还算是好的。”

彭真伙同李维汉、徐冰等人配合西藏反动农奴主班禅检查西藏工作中所谓“左”倾，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六月，在天桥剧场看了青年演员联合演出京剧《白蛇传》后说：“要多演历史剧，特别是演改编的历史剧，我不大同意京剧老演《白毛女》，因为有话剧、歌剧在演嘛！京剧可以演历史剧来教育人民。”疯狂反对京剧改革。

四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彭真窃据了我党代表团团长职位。在会上干尽了投降主义的勾当，赫鲁晓夫在会上恶毒地攻击我国三面红旗，把彭德怀称作“朋友”，诬蔑我在印度问题上是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彭真一概不予回击，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和彭真吵完架，马上又和彭真拥抱。事后，彭真恬不知耻地说：“他还不敢决裂，吵架是吵架，吵完他还和你拥抱。”彭真还说：“赫鲁晓夫在会议上骂我们，我只要敬一杯酒就可以讲五分钟来答复他，但是为了照顾团结，而且因为资产阶级记者在场，没有这样做。”

回国后，彭真与刘、邓串通一气，粉饰自己在布加勒斯特的投降主义行为，到处宣扬吹嘘，他“顶”住了赫修的突然袭击，因此进一步骗取了以后历次出国谈判代表的席位。

六——七月，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时，在邓小平的示意下，由彭真直接策划的打着“照顾中央首长”的旗号，在北京市百货大楼开设了“七号黑店”，各种呢绒、绸缎、名牌香烟、高级食品、各种名贵土特产，应有尽有，经常出入黑七号的有王光美、邓小平的老婆卓琳、彭真的老婆张洁清，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罗瑞卿、刘仁、廖汉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他们享有各种特权，明暗拿，化公为私，至今还“赊账”四万余元未还。

彭真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的指示下，伙同旧北京市委万里等搞了一个“高干俱乐部”，正当国家困难时，大肆扩建，搬走了一个医院，拆掉了大批民房，违抗周总理的指示，秘密施工，浪费资金一千万余元。在这个“裴多菲式的”

俱乐部里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刘仁、万里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常出入，聚集在一起狼狈为奸，大搞反党阴谋活动，秘谈之余，尽情玩乐，每年挥霍数万元。

八月，彭真竭力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矛盾的性质，他说：“赫鲁晓夫说没有人民内部矛盾。我问他，那么你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矛盾是什么矛盾？难道是敌我矛盾？”“又比如我们和苏共分歧的矛盾是什么矛盾，是敌我矛盾？”

九月去莫斯科参加两党会谈，对苏修给我们施加的种种压力，不予揭穿，并卑躬屈膝地向敌人乞求“援助”“要求供应一部分粮食”，真是丧权辱国，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十月，参加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起草莫斯科会议文件，把文件起草的领导权，和起草工作完全让给苏修去搞，在他的投降主义思想控制下，在二十六国委员会上就没有提出我们的文件草案，给我的斗争造成了极其困难被动的局面。

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十日，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彭真及陆定一、杨尚昆等都是团员。由于康生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斗争，打掉了宣言草案中一些苏修观点，加进了我党一些正确观点。但是刘、邓、彭拼命推行“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赫修妥协，在宣言中保留了对苏共二十大的赞扬，强迫刘宁一同志放弃斗争，在“和平宣言”、“告世界人民书”上，保留了赫修战争恐怖的主张，对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让步、乞求的“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货色。

十二月，彭真在全国政协和人大常委作报告，说中苏“分歧是部分的”，是“兄弟吵架”，吹嘘“团结”。

一九六一年

一月，毛主席在八届九中全会（讨论“农村六十条”）上，批评了彭真和邓小平不下去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彭真把毛主席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口号接过去，乘机在这一年布置了许多黑调查，搜集攻击毛主席和三面红旗的子弹。

彭真一贯十分注意抓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准备，他利用“三家村”这个反党工具，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射出了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一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三家村”黑店反党急先锋吴晗在《北京文艺》发表了他的大毒草《海瑞罢官》，戏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理不公”，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叫嚷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回来主持“朝政”，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二月，刘邓通过旧中宣部写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恶毒攻击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典型”等等。彭真看了，如获至宝，盗用中央名义，于三月十五日批发全国，以抵制日益高涨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流毒极广。

三月，“三家村”黑店掌柜，大叛徒邓拓的《燕山夜话》在《北京晚报》出笼。八月廖沫沙也抛出了“有鬼无害论”，十月“三家村”在其后台彭真的指挥下开始营业。

四月六日，彭真在人大常委会一次讲话中，诬蔑大跃进成了“大问题”，并散布悲观论调说“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荒，能否渡过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四月，彭真伙同邓小平在怀柔、顺义搞所谓“农村调查”，向毛主席写报告，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大吹物质刺激“三包一奖”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方法。

鼓吹单干、包产到户。四月，彭真亲自到怀柔县西三村，让他们搞半包产，彭真说：“五十人种地，谁种的好，谁种的坏，不清楚，现在四、五个人一起种地，彼此清楚”。

四月，彭真在怀柔县以调查食堂供给制方面的问题为名，大肆攻击党中央，攻击三面红旗，彭真别有用心的说：“北京这几年农业减产的原因，天灾是次要的，主要的原因二个，一是平均主义，一是干部瞎指挥，搞得几年挨饿，必须追究责任，要偿罚分明，至于谁负责任，现在不说，回去检查。农业被动，原因是没有很好调查研究，过去晋察冀，三年就上了轨道，现在十几年也没上轨道，政策来回变怎么能行！”

彭真煽动干部反对中央，谈到所有制时，他说“你们要好好研究六十条、十二条，历年来中央、市委、县委关于所有制的指示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

还恶毒地攻击集体经济和党的政策，胡说什么“农民对集体经济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有两种可能：一是集体经济是错误的，二是具体政策有问题，要让大家鸣放。”他还主张用党费来补贴干部工分，大肆鼓吹物质刺激。

彭真还恶毒的说“群众要有点小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性格也不一样，五亿农民怎能都搞一样，总是立正、稍息、上操，弄得太死是不行的，要有自由，现在搞的太划一太死，这是上边主观想像出来的”，他鼓吹的“自由”，实际就是搞单干的自由，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

四月二十日，彭真在怀柔调查人民公社问题时，在一次会议上极力反对政治挂帅，提倡物质挂帅，他说：“那里有农民不计利害呢？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村人口，人人感到有利，这才具有积极性。苍蝇见肉就抢，猪逐臭，但他有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听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物质利益，也有一套政治挂帅——自由、平等、博爱。封建社会也有他的政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吹捧美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四月十九日，彭真在怀柔在一次会议上说：“每块地要搞责任制，奖钱、奖实物。……农民第一是劳动的，但是自私，连我们干部在内，公家的东西就爱护差些，个人东西就爱护好些，你们怎么把农民估计得那么高？还是要政治和物质利益相结合”。提倡责任田，包产到户，鼓吹物质刺激挂帅，在农村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彭真在此次讲话中更露骨的说：“包产单位富了，咱们国家就好办了，这是社会主义！”贩卖修正主义的福利国家的货色。

六月，彭真先后两次和李维汉、徐冰等人谈统战工作时极力为资产阶级辩护，反对批判资产阶级，他说：“两年欠收人祸有多少，资产阶级在背后大讲、中讲、小讲，让他们骂去好了，”“无论他们怎么骂，我们听着，如果不愿意听，可以把耳朵塞起来。”“人家生活这样困难，你还要整人家，要说你情理不通了”，他还无耻的说：“在供应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进行斗争，因为斗争对我们不利，我们说话气不壮，二尺半布票，浮肿病，高价糖、糕点”，甚至说“现在斗争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条件、错误的地点，如像

美国人说在朝鲜同我们作战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条件、错误的地点一样。”彭真不愧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七月，正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狂热鼓吹“三自一包”，“三降一裁”的反动纲领的时候，彭真在北京市人委和市政协常委联席会议上说：“工人阶级要站在困难的最前线，不然算什么工人阶级，不然等将来写光荣历史的时候，自己的表现是怎样的？趁现在还不好好表现自己的革命意志。”“我们对工商界这两年的情况感到是满意的，……现在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是经历了两个考验的，这两年灾荒，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是同全国人民同舟共济的。这两年来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活，当然降低了，特别是大的民族资产阶级生活降低了。但是并没有什么人向党猖狂进攻，这是好的。还胡说资产阶级和我们是“同心同德”“团结一心”等等，极力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六月，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刘、邓、彭合伙拼凑的，事先彭真曾把黑帮分子王汉斌叫到家里修改此稿，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七月，彭真召开香山会议，找京西矿务局，石景山钢铁厂等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汇报，支持郑天翔提出的“精兵、精武器”主义，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主张技术挂帅、设备挂帅，阴谋进一步大搞独立王国。

七月六日，在一个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恶毒地说：“一九五八年以来，工厂遗留的问题很多，到底都是些什么问题？要一一调查清楚，例如生产上去了原料供应不上，机械设备损坏严重，维修力量跟不上；旧的规章制度打破了新的没有建立起来，企业无章可循，管理混乱，工人招的太多了，增加了城市人口，影响了农业的劳动力，这些都要调查清楚，不能‘讳疾忌医’。这年二月到八月，彭真亲自指挥大搞“工业调查”，与此同时，还布置财贸系统搞“财贸调查”，文教系统搞“教育调查”，在各行各业、各部门，无孔不入地搜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所谓“错误”，制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炮弹”。根据彭真的布置，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泡制“北京市工业十五条”，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

七月六日，在一个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彭真与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一唱一和，大肆攻击文化科学战线上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公然提出：“我们要向资产阶级还账”，号召“党的干部要老老实实的做资产阶级教授、专家的‘勤务兵’，好好为他们服务。”奉行的完全是阶级投降主义。

七—八月，彭真去北戴河参加邓小平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泡制“工业七十条”和“高校六十条”，彭真对“工业七十条”亲手作了修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用这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对抗毛主席提出的“鞍钢宪法”，毛主席多次提出修改“七十条”，他们都顽固地加以抵制。

彭真在北戴河，还把赫鲁晓夫准备提交二十二大通过的“三和两全”修正主义纲领（草案）仔细朗读了一番。

九月彭真去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伙同刘邓，背着毛主席把“工业七十条”、“高校六十条”以及“科学工作十四条”，盗用中央名义批发全国“试行”。

彭真还勾结邓小平，支持陆定一提出的“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中贩卖“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黑货，为牛鬼蛇神肆无忌惮的向党进攻发行了通行证。

《高校六十条（草案）》在刘、邓和彭、陆的支持下，以中央名义发布执行，这个条例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它否定了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恢复了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那一套，削弱了党对高等学校的绝对领导，抹杀了高等学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片面强调以教学为主，鼓吹智育第一，书本知识至上，宣扬政治落实到业务的修正主义观点。歪曲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只讲团结不讲教育和改造，恢复了专家路线。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肆吹捧积极贯彻这个黑纲领。

十月，彭真布置给刘仁，搜集攻击三面红旗的子弹，刘仁又找了赵学政等一批人，以回乡探亲为名，搜集京汉线各县的情况，彭真带着张彭，张道一与刘仁在石家庄、保定，搞过两次攻击三面红旗的汇报会。

十月，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赫修在会上大反阿尔巴尼亚，并正式通过了系统的修正主义纲领，周总理在会议中途回国，以示抗议，彭真不顾康生同志劝阻，竟伙同陶铸到列宁格勒访问，大搞投降活动。

回国以后，又大作报告，继续把自己装扮成反修“英雄”，同时继续在群众中散毒，说赫修要打中国是不大可能的，发动不起群众。

十一月、十二月，在刘、邓直接操纵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亲自指挥旧北京市委一小撮穷凶恶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项子明、王汉斌等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非法秘密审查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以来毛主席的报告和毛主席批示的中央文件，收集攻击毛主席的子弹。这就是惊心动魄的“宫庭政变”阴谋——“畅观楼”反革命事件。他们把搜集到的所谓“缺点”“错误”强加到毛主席身上，妄图赶毛主席下台，并准备了一个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妄图实现赫鲁晓夫式的“宫庭政变”阴谋。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后台，妄图篡党、篡国的狼子野心的大暴露，是他们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铁证。

十二月，彭真回山西老家，借探亲为名，收集反党子弹，在山西、河北开了一系列的黑会。搜集三面红旗所谓“缺点”“错误”。大反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大肆放毒，罪恶累累。

回家探亲过的资产阶级腐朽的贵族生活，吃住都在专车上，吃的水都是专车自带，抽调大批保卫人员保其狗命，两次回家共八、九天时间，花去路费五千元，挥霍民财。

十二月，还指示刘仁、郑天翔等制定了对十三级和十七级以上干部的副食品（肉、蛋、糖、豆等）补助办法。进一步培养特权阶层。刘、邓黑司令部作为经验推广到全国，影响极其恶劣。

一九六二年

我国渡过了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经济上取得了好转，但阶级斗争仍然很激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資

本主义制度，他們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代表，彭真则是刘、邓黑司令部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他们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策动了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的“三自一包”“三降一灭”“合二而一”等等一齐出笼，刮起一股单干风、翻案风、投降风、自由风。彭真叫嚷什么“不管黑猫、黄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还是包产好”等等。在我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刹住了这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黑风。

年初，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攻击三面红旗为中心的黑报告，彭真参加了这个报告稿的整个炮制过程。大会上彭真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会上中央批评北京有分散主义，私分一机床厂生产的机床。彭真对抗中央的批评，并责令他手下干将郑天翔、张彭等弄虚作假向中央写假报告，说明是来料加工，不是私分机床。

二月，在西楼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狼狈为奸，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并伪造巨额财政赤字，要挟毛主席。

三、四月，在彭真直接指挥下，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黑报告。彭真在刘仁传达报告时多次插话，一个劲地宣扬北京顶住了单干风，搞的很好。问题是中央刮了共产风，全国各地搞的不好，中央政策也多变，影响很大，等等。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并极力抬高自己。在彭真的带动下，会上，群魔乱舞，乌烟瘴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借题发挥，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拼命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猖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春天，彭真在民族工作会议上，再度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阶级合作论。他说：“在我国已经废除阶级剥削和反动阶级的压迫。因而也就消灭了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就有了坚强的团结基础。”说什么“过去剥削，现在不剥削了，过去压迫现在不压迫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往前，一切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人，都要团结起来。”

四月，邓小平、彭真篡改毛主席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搞了一个“加速平反”的黑指示，为那些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指示中胡说什么，“近几年来感到批判、处分的人很多，拔白旗、反右倾、整风，补课百分之八九十是错的。”通知下达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翻案风。旧北京市委积极贯彻这个黑指示，全市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受批判和受处分的百分之八十九以上都翻了案。

五月末到六月初，旧市委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选举市委委员，候选人名单是彭真一手炮制的，并事先经邓小平批准，结果当选的六十七名委员及候补委员，几乎都是彭真死党分子。

六月，彭真在一次形势报告中说：“当前我们的根本任务，一是吃穿用，二是逐步建立完整的工作系统。”又一次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六月，彭真在同反动大农奴主班禅等的谈话吹捧说：“像你们是站在党的立场，百分

之九十以上劳动人民的立场，……党一贯把你们当党员使用的。”并无耻地说：“若有来世的话，我们来世还合作共事，十年、百年、千年，合作到底。”彭真无耻吹捧大农奴主并愿意与之合作，而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则一再寻机攻击，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用心险恶地说：“现在居然有人传说，毛主席不当主席，撤职去当县委书记了。”彭真用造谣诬蔑的手段，妄想把毛主席赶下台。在对高校毕业生报告中，彭真竟狂吠什么“不能说除马克思、列宁、毛主席以外，再没有比他们更聪明的人了。”彭真还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希特勒、杜勒斯等反动透顶的魔王相提并论。这一时期彭真多次用人间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放肆地叫喊：“多下罪已诏也没有用，问题是要有解决的办法。”“越下罪已诏，越要亡国。明朝崇祯就是这个样子。”“解决不了人民生活问题，就应该到景山上吊去！崇祯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去上吊的嘛。”彭真反革命气焰多么嚣张，猖狂至极，罪该万死。

市工代会、青代会、妇代会等会上，彭真公开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违抗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他把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和我党的分歧，比作是家庭兄弟姐妹父母之间意见不一致，而引起的吵架。妄图抹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现代修正主义分歧的阶级实质，为他在国际活动中干的许多投降主义勾当打掩护。

毛主席批评“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彭真包庇说：“中央组织部还是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主要是书记处没向主席反映，责任在书记处”。安子文在刘、邓、彭支持下，抗拒主席批评，公然污蔑主席“不了解中央组织部情况”，叫嚣“我不能学陈伯达”。

彭真在刘少奇的支持与庇护下，又伙同安子文为大叛徒杨献珍翻案。早在一九五二年以来，刘、邓黑司令部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包庇大叛徒杨献珍，支持他们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康生同志，打击艾思奇同志。这时候彭真在刘少奇指示下，伙同安子文、杨尚昆等一伙狐群狗党出面，派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工作组，忠实执行刘少奇的“指示”，替杨献珍翻案。彭真在杨献珍的假检讨上写道：“主席，我看此案可以结束了。”林枫趁忙把这个文件印发给全校十七级以上干部阅读，压制群众揭发，包庇杨献珍。很早，彭真就吹嘘过：“杨献珍读书多，马列主义水平高，负责高级党校成绩显著。”“杨献珍被选为中央委员是我提名的。”卖劲地为杨献珍翻案。

八月，刘氏黑《修养》再版，一出笼彭真布置要北京作到人手一册。旧市委就抢先赶印一百四十万册，在北京内部发行，广泛组织学习和讨论，反党刊物旧《北京日报》、《前线》、《支部生活》大肆贩卖刘氏《修养》黑货，以此对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彭真还在旧市委扩大会议上，造谣说，毛主席在延安在四十多岁，就选中了刘少奇作接班人。同班禅谈话中，也格外吹捧刘少奇，并告诉班禅说：“刘少奇选集正在选编中”。肆无忌惮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党、篡国制造舆论。

八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彭真与刘、邓合谋把罗瑞卿、陆定一塞进了中央书记处，从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四大巨头都挤进了书记处，大批的党羽安排到重要岗位

上，为篡党、篡军、篡政作组织准备。同时，他们利用窃据的要职，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讲形势、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批判“三降一灭”、“三自一包”。在此之前，在彭真的支持与庇护下，新华社北京分社派了调查组到房山去搜集所谓“阴暗面”的材料，制造反党子弹。毛主席讲话后，彭真为了掩盖他的反革命阴谋，赶紧亲自与黑帮分子刘仁、吴冷西密谋对策惺惺地让新华社翻过来专门搜集成绩以便把自己反革命的面目伪装起来，潜伏下来。在会上会下耍阴谋活动，掩人耳目。

年底，彭真起草五反指示，在这黑指示中，大谈五反要落到生产上，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如搞公物还家、反对大材小用等等，根本不谈阶级斗争。五反运动开始发动时，群众贴了很多大字报，刚刚形成高潮，仅仅一两天，彭真就下黑指示，划框框、定调调，提出梳辫子，不引导群众再揭发，把群众运动镇压下去，致使五反运动夭折，走了过场。

由于自己心里有鬼，彭真对五反检查多吃多占不满，不打自招地说：“多吃多占北京市我第一”，又蛮横地叫嚷：“我不检查，因为检查了，我还要比你们住的多，用的好”。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三年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一九六三年更深入的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运动），江青同志高举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大旗，积极进行京剧改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新阶段。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五反运动和京剧改革的罪恶活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一月，彭真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包庇中央统战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中央统战部工作中的投降主义路线，彭真和毛主席大唱反调，直到本年一月份，还对中央统战部徐冰等几个副部长说：“统战部的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没有，不存在这问题。”彭真还放暗箭说：“没有谁讲话百分之百的对。”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本月份，彭真对民主党派的一次报告中，大肆鼓吹阶级合作。他说：“我们同各民主党派共事，共同管理国家至少十几年了。我们是朋友、同志关系。”他还胡说什么“我们和民主党派到了披肝沥胆的程度”。这一年彭真和他的总后台刘少奇、邓小平相互勾结，和安子文合谋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制定了重新登记党员的所谓“十条标准”，明目张胆地篡改党章，阴谋把我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全民党”。

三月，彭真在旧市委工作会议上，恶毒地影射攻击毛主席“思想僵化”，“不如皇帝老子”，“不如地主阶级的头子”，他还狂妄地叫嚣“有错误就得改”。四月，彭真在中央

统战部攻击毛主席也犯过错误。他说：“像马克思、列宁、毛主席，他们都随时修正错误，从错误中学习。”同年十一月，彭真狂妄地要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检讨自己”。他在旧市委工作会议上恶毒攻击毛主席说：“有的人想要别人抬着轿子，自己坐着上山。碰到困难，出了毛病，往往责怪别人，不检讨自己，一味埋怨别人的轿子抬的不好，自己没有责任。”彭真说这些话是多么阴险毒辣！多么狂妄！彭真在政协三届四次会议上煽动别人攻击毛主席。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包括毛泽东主席也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朋友们指出来。”他污蔑毛主席“也有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要经常整风”，说毛主席“还天天洗脸”。彭真反对外事工作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对其心腹说：“外事干部第一要学习时事，第二要学党的政策，第三要学外语”，只字不提学习毛泽东思想。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妄想把毛主席赶“下台。”他恬不知耻地说：“毛主席早就考虑了他的接班人（指刘少奇和他自己）。”他和其黑后台刘少奇一唱一合要毛主席“让位”、“下台”。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狂妄地叫嚣“不要占着茅房不拉屎，要下台、要让位，不要摆老资格”，不久，彭真也叫嚣“不能论级别辈数，我们不是青红帮”。这些反动家伙的反革命气焰是多么嚣张！

五月，彭真一直对抗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阶级、形势、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伟大指示，迟迟不开展社教运动。这年二月毛主席又肯定了河北、河南等省社教运动的经验，并指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彭真仍然置之不理。直到这年五月，在杭州会议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前十条”，彭真迫于形势，在会议期间就打电话回来让赶紧应付。黑帮分子冯基平、赵凡、郑天翔等仓促上阵搞试点，炮制反革命的黑经验。另一方面他亲自出马做报告、放毒箭，竭力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上邪路。

五月至六月份，彭真到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七省“视察”，抢先剽窃“前十条”，以捞取反党的政治资本，他在各地都向干部做过报告，大肆放毒。另一方面他搜集攻击社教运动的子弹。他攻击说：“有些地方没有准备好就要大干，有急躁冒进情绪”。他还一再强调要防止三种“偏向”，对待上中农（实际上是新富农）问题上“不要打击面过宽”，对待未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子女问题“要从宽处理”，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要区别对待，“从宽处理”。彭真搜集来的所谓“材料”和“宁右勿左”的口号，正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意，他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于九月份，炮制了“后十条”，这是一条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上半年开展五反运动，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一次大反击，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彭真却把这场斗争局限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彭真在关于五反运动的讲话中，一再强调运动“自始至终要以增产节约为中心，不能耽误生产”，妄图以生产压运动，极力鼓吹五反运动的经济意义。彭真为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叫嚷要让干部“洗温水澡”，“不要洗热水澡”，要让“各级领导干部自己检查”，根本不谈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彭真在报告中还攻击过去的政治运动。他说“过去的政治运动有很大的后遗症，这次五反运动要尽可能不留后遗症”，妄图把五反运动纳入他的修正主义轨道。彭真在关于五反运动的讲话里竟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多吃多占”的原因归之于“管理上的问题”，胡说什么“主要是过去几年对供销社的作用估

计不足”，“对市场管理放松”，妄图否认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竭力贬低五反运动的伟大政治意义，妄图掩盖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彭真的黑手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五反运动虽然由于彭真的破坏遭到很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给予有力的回击。

七、八月份，旧北京市委机关的五反运动在轻描淡写检查一下走后的“错误”后，宣告结束了，群众检举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材料被彭真、刘仁包庇了下来。五反运动开始后，北京市文物商店的徐铭同志检举了邓拓倒卖字画牟取暴利二万三千余元的罪恶事实。彭真在中央发给他的简报上发现刊有徐铭同志揭发的材料，抄录下来以后，彭真在上面批“送天翔、万里、邓拓阅”，并且用不表示意见的办法向邓拓等人默示没有什么，使他们放心。后来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彭真亲自出马，保护邓拓过关。在彭真的指使下，由他的忠实走卒项子明、李琪、孙方山等组成一个假调查真包庇的“专案调查组”。这些家伙按照其主子的意旨，绞尽脑汁进行包庇，把邓拓的投机倒把犯罪行为硬说成是“合法的”“换购”“出让”。经过五反，不但不处理邓拓的问题，反而围攻徐铭同志，要徐铭同志承认揭发问题不属实，收回控告信，甚至还追查徐铭同志的历史，诬蔑徐铭同志是别有用心，进行百般刁难、迫害。彭真还把大叛徒、大投机倒把犯邓拓带去见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刘少奇为邓拓撑腰打气。就这样在刘少奇和彭真的大黑伞下把邓拓又包庇下来了。

十月，彭真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继续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为他们这伙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年初，彭真大肆诋毁现代戏，他说：“京剧川剧表演现代生活，一唱就不亲切了”，“这些戏我总是不看，看了要想问题，我睡不好觉”。其实彭真看的所谓历史剧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的。他曾让三反分子张梦庚写为彭德怀翻案的毒戏《于谦》的剧本。这一年国庆节，在彭真的指使下，旧文化局命令剧团把《于谦》扎成彩车，于谦手持宝剑，从天安门前经过，向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示威，其用心何其毒也！十一月，彭真在旧市委扩大会上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戏开了绿灯，说《打渔杀家》不能说是宣传封建思想的戏，《打金枝》、《杨门女将》都可以演。十一月，江青同志把上海人民沪剧团《芦荡火种》的剧本拿到北京，让北京京剧一团改为京剧，把京剧一团作为江青同志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突出北京，把《芦荡火种》改为《地下联络员》，对剧本的重要情节作了篡改（后来江青同志又让改过来了）。在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后改为《沙家浜》）的排练过程中，彭真指示其忠实打手李琪等百般刁难江青同志，阻挠现代戏的排练。在《芦荡火种》公演前的头一天，票已全部卖出，彭真借口“粗制滥造”命令退票，对江青同志施加压力。随后彭真把北京京剧一团的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叫到家中下黑指示，说：“要鼓足干劲，不要着急”，“学校有历史课，舞台上就得有历史戏”等。顽固对抗京剧改革。十二月，毛主席观看上海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并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彭真为了对抗毛主席亲自表扬的这出戏，亲自抓《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剧，对此剧内容作了多次修改，让北影拍成电影，并在报刊上大加吹捧、宣扬，想方设法诋毁《霓虹灯下的哨兵》。彭真的手段是多么恶毒！十二月十二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作了第一个批示，指出：文学艺术的“许多部门至今还

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是直接批给彭真、刘仁的。反党头子彭真拒不执行，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先后两次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与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布置旧市委搞文艺调查，叫嚷“北京近年来出了很多好剧目”，“文艺工作成绩很大”，“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年底，江青同志和柯庆施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亲自在上海主持举行了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彭真把北京实验京剧团（彭真的黑实验团）派到上海去演老戏毒戏《于谦》、《赵氏孤儿》等，与现代戏唱对台戏。江青同志为了扩大现代戏的影响，把上海沪剧团请到北京来演《芦荡火种》，进行示范演出。彭真百般刁难江青同志，消极冷淡，不给安排场次。彭真曾对北京实验京剧团的青年演员说：“从现在起要刻苦锻炼五年基本功，打好传统戏的基础，没有排现代戏的任务。”彭真还曾说：“什么事情都得有继承人”，“要有计划叫青年拜师”，让这些青年拜倒在反动“权威”马连良、周信芳等反革命右派脚下。彭真指示旧文化局艺术人员中的“青年尖子”可以一次提三级，被定为尖子的演员让其入团、当政协委员、入党等，以此来拉拢腐蚀青年，培养修正主义的接班人，顽固对抗京剧改革。由于江青同志亲自领导和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京剧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彭真破坏京剧改革的阴谋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十一月，彭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他在阅改《关于第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时间的决议》（草案）时，亲笔将草案中的“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一句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字样砍掉，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样三面红旗就砍掉了两面。彭真假借富尔之口，用造谣、诬蔑的手段攻击人民公社。他说：“富尔问毛主席，有人说公社失败了，毛主席说，公社就是大合作社。”这是彭真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大诬蔑，对人民公社的恶毒攻击，彭真的狂叫丝毫也无损于三面红旗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伟大作用，相反证明他是社会主义的死敌。

一九六四年

一月，彭真用造谣诬蔑的手段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在人大会堂大庆油田工作报告会上的插话中说：“老旦唱戏，别人不爱听。”他还造谣说：“主席说过，他的错误一火车都拉不完。”彭真借提拔干部为名，影射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说：“干部就象割韭菜一样，要一茬一茬的割，不割就不再长了”。彭真篡党篡国的狼子野心暴露得多么明显啊！四月份，彭真在山西曲沃县和×××、×××的谈话中极力贬低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伟大贡献。他阴险地说：“毛主席说《毛选》是无数同志血汗的结晶，不是他写的。”想一笔勾销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功绩，其用心何其毒也！彭真还借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赫秃之口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说：“赫鲁晓夫说，我们的人民公社垮了，大跃进、总路线搞错了，还说毛主席不民主，为维护毛主席的面子，对外不承认错误。”在这一次谈话中，彭真还攻击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勉强”、“形式主义”。他说：“学习要自愿，不要勉强。勉强有人不到会，还要骂。……象买卖

婚姻，勉强撮合一辈子闹意见……来几个算几个，不愿意学的也不要学人家落后，不要造成空气压力，勉强了就出形式主义。”八月份，彭真对抗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反对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胡说什么“白区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看进步的文艺小说。”彭真给全市高校毕业生作报告时，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倡学习社会发展史，闭口不谈毛主席提出的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他按照刘氏黑《修养》的调子，以个人成长为重心来谈所谓“前途”，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十月份，彭真又想方设法贬低毛主席的伟大作用。他对新华社干部的谈话中叫嚷“毛主席不是一点错误都没有，只是他的错误没有人比他再少，对他也要一分为二。现在形势好转了，这不是主席一人之力。”十二月，彭真在政协四届一次常务主席扩大会议上，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说：“中国历来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圣贤就没有过，那是牛皮。圣贤就没有过啊！那里没有过哩？”彭真把持下的旧北京市委外办，极力反对在外事工作中宣传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人民日夜想念毛主席，渴望能得到一本毛主席的宝书。可是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准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已经赠送的，不顾对方要求，勒令退回，逼得一些外国留学生不得不暗地里逐字逐句抄下来。彭真是毛泽东思想的死敌。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一月，彭真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打出“先立后破”的黑旗，他们闭口不谈文艺工作的方向路线错误，一味鼓吹“立”。彭真在刘少奇的指使下，让旧中宣部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文艺方面的黑指示，鼓吹只立不破的方针，公开对抗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一月三日，彭真和刘少奇、邓小平、周扬等相互勾结，召开文艺座谈会，进一步对抗毛主席的第一个文艺批示。会上，彭真胡说用芭蕾舞演《白毛女》、《朝阳沟》“这就是洋教条，这是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强加于群众，结果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江青同志对此针锋相对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个立场问题。”彭真还在会上散布错误人人有份的谬论，攻击毛主席，要周扬等文艺黑帮“振作起精神来”，继续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真是反动透顶。会后，旧北京市委立即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传达刘、邓、彭的黑精神，向中央写报告吹嘘自己。彭真并且指示邓拓、李琪把《文艺情况调查》、《文艺界情况》密送彭真，搜集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子弹，顽固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的批示。三月十四日，毛主席指示：“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市，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什么东西，你不下乡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彭真大为不满，说什么：“演的不象就去看看，熟悉工农形象，谁也没见过古人，古人到那儿去体验，还到棺材里去体验？”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伟大指示。三月，彭真在看北京京剧团采排大毒草《社长的女儿》后说：“京剧为什么这一时期光搞现代剧？这就是跟写字一样，不能光用左手写，现在就是把左手捆起来，专用右手，写现代戏，演现代戏，演过了关，群众满意了，再搞历史剧，总还是两条腿走路的。”彭真在这里拐弯抹角地反对京剧改革，妄想还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继续统治舞台，为复辟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彭真为了破坏京剧改革，把北京实验京剧团作为他们的黑实验田，用大毒草《箭杆河边》对抗《芦荡火种》。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箭杆河边》曾提出

过严厉批评，指出“此剧不能压邪”，“反面人物太嚣张”。彭真听到以后，非常嚣张，对实验京剧团下黑指示，说什么“不要怕反面人物把你压倒”，“反面写的成功不要紧”，还说“加强正面人物，不必削弱反面人物”，“地主要放开演”。彭真在看完戏后，洋洋得意地说：“地主演的最好。”彭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这里不打自招了。江青同志第二次看了《箭杆河边》后，提出“不要急急忙忙的改，要改就彻底改好”，彭真又大唱反调，说“这个戏基本上可以了，不用改了。”彭真搞独立王国，把《箭杆河边》作为对抗戏剧革命的样板戏。彭真经常吹嘘说：“我听现代戏中，只有《箭杆河边》劝二赖子和《延安军民》（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戏）中老班长的唱腔最好听。”彭真亲自指使旧《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大吹大擂，并大放录音，扩大影响。全国京剧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前，在江青同志的关怀和亲自指导下，北京京剧一团革命现代戏《芦荡火种》排演出来了，趁江青同志不在北京，彭真指使大演特演，以彭真的名义发消息，宣传北京，突出彭真，贪天之功，据为已有，捞取政治资本，企图把革命样板戏停留在《芦荡火种》的水平，彭真却恬不知耻地说：“北京是京剧的策源地，在排演现代戏上，北京应起带头作用”，一语道破了他的野心。江青同志曾指示《芦荡火种》要削减刁小三的戏，“三茶馆”一场最好不要。要突出武装斗争。彭真却说“刁小三这个人物有戏，不要改”，“三茶馆不要动”。他还攻击江青同志说：“这个戏本来就不该。”六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再次对文艺工作做了重要批示，彭真、陆定一等先是封锁毛主席的指示，不往下传达。后来封锁不住了就搞假整风，借此，保护一批文艺黑帮过关。“整风”中有人揭发问题时涉及到刘少奇、邓小平定的文艺八条，提出“为什么中央批了这个文件？”彭真慌了手脚，一面下令只准揭本单位和旧文化部的问题，不要涉及“中央”，另一方面又让齐燕铭、夏衍等黑帮先受点“委曲”，“自己把问题包下来”，不要说什么都是“从上边来的”，玩弄了舍车马，保将帅的大阴谋。彭真还叫嚣什么“夏衍、齐燕铭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要给出路，其他人统统赦了，清理一下思想就行了。”包庇了大批牛鬼蛇神。旧市委还召开了第二次“文艺工作会议”，大反毛主席的指示。正在江青同志领导京剧改革的时候，彭真让李琪（旧市委宣传部长）搞了一百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叛徒的历史剧目，准备演出。他无耻地歌颂汉奸，宣扬活命哲学的反革命京剧。这一年彭真还说：“《四郎探母》是我叫演的，那时候没有现代戏，不叫人家演，吃什么？《四郎探母》演了那么多年了，演出了个社会主义，现在一演，社会主义就能垮台了吗？”彭真顽固地对抗京剧改革，并且百般刁难江青同志。七月一日，彭真在京剧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作报告中大放厥词，要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声称京剧一定要革命，掩盖自己反对京剧改革的反革命面目；另一面却露出狐狸尾巴，大嚷“保持一个统一的京剧艺术的风格”，“不要搞成四不像”，“不要粗制滥造”，“不能象糖炒栗子”，“象吃爆肚”。还嚷什么“传统戏不是永远不可以演，等现代戏演顺了手就可以拿出来了”，“是暂时不演”，散布京剧演现代戏一阵风的空气，为来日的疯狂反扑设下了伏笔。此后，彭真在国际饭店市委扩大会议上说“主席说这个报告很好”，用造谣手段来抬高自己，掩盖自己反对京剧改革的罪行。八月六日，彭真关于京剧演现代戏的一次谈话中说“《四郎探母》、《二进宫》能演这么久，人家爱看，主要是情节上、音乐上安排得好。《二进宫》只是三个人傻唱，但人们就爱听”。继续吹捧古戏、毒草。十一月，在彭真的直接指挥下，文化部的“整风”草草收兵。在文化部“整风”过程中，群众提

了许多问题，彭真为了保存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找了一条“理由”，说文化部门知识分子太多，都是世界观没有改造的，不能自己整自己，应该让他们先下去四清，先改造世界观以后再说。对文化部负责人夏衍、齐燕铭等四人分别提出了“处理意见”。如夏衍罢了官再另外安排工作，齐燕铭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撤了其他职务，只保留政协委员，让陆定一兼文化部长。群众揭发了林默涵的问题，林根本没作检讨，就这样文化部的假整风就此结束了。周扬的整风总结报告曾两三次送彭真修改后才出笼。年底，彭真又一次为《四郎探母》捧场叫好，胡说“有人说《四郎探母》是投降主义的赞歌，他唱他的《四郎探母》，我们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就是爱听那个腔调调什么！”

二月，彭真、刘仁、赵凡等，对抗毛主席分期分批有步骤进行四清的指示。策划在北京各区县全面开展农村四清，这批搞一百一十三个公社（一九六三年十月开展的七十三个公社尚未搞完），剩下一百多个公社计划冬季搞完。他们把这称之为“淮海战役”的第二批四清安排在农忙季节，运动与生产有矛盾，企图使四清运动走过场了事。以便保护党内走资派的目的。工作队普遍进村后不宣传“前十条”（只读了一遍），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有问题的干部顶着不交代，春耕生产布置不下去，运动处于停顿状态。五月份搞人口普查，七月份全部撤出工作队，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了这批农村四清运动。七月，在旧市委工作会议上大放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的录音，彭真让他的大秘书把此录音取到他家中放了几个小时，他赞不绝口，指示旧北京市委大量复制，大放特放，大力推行刘少奇形“左”右的四清路线。大会总结时彭真到会讲话，他闭口不谈这场四清运动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一定会遇到阻力的，而说“四清清不下去，五反反不下去，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够”。他根本不谈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而说：“多吃多占发展下去就很危险。”这一年彭真在市贫代大会上讲话中，他把严重的阶级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否认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抹杀敌我关系。他说：“四清运动就是整风，就是治病救人，与人为善，一看二帮，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八月份，彭真积极贯彻刘少奇提出的农村、工矿社教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黑指示。彭真亲自指挥在通县集训两万多名工作队员，搞人海战术。九月至十一月份，中央调查组到北京大学去搞调查，发现干部路线有问题，陆平、彭珮云的问题严重，哲学系、经济系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北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发了陆平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和实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量事实。陆平检查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彭真插手北大，把陆平、彭珮云找到家中，要陆平顶住，对陆平说：“不要承认，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检讨。”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追根子追到彭真、刘仁头上，彭真恐慌万状，凶狠地大叫：“追根子追到市委来了，这样追下去还得了！”他们为了保持北大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开始了对北大社教运动的疯狂镇压。十一月，彭真和他的总后台刘少奇、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四清面上工作座谈会”上，一唱一合，提出“抓分配、抓生产”的方针，反对学大寨，提出“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不是对准一小撮），主张“对干部约法九章”，“施加压力”，提倡投机倒把、自由竞争，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十二月份彭真打

击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严厉地批判了刘仁在通县白庙大队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彭真对此强烈不满，恨之入骨，一面勒令中宣部对戚本禹同志进行批评，一面策划在北京《农村四清报》上进行围攻，又写报告密送他的黑后台刘少奇。刘少奇说：“刘仁的工作作得不错”，进行包庇。这种手段多么恶毒。这一年，中央工作队在石钢炼铁厂搞四清，整了党内走资派，也触动了彭真、郑天翔，他们便依仗刘、邓的权势，打击工作队，破坏四清运动。旧市委一再逼工作队说：“问题通天了，总书记说话了，赶快检讨吧！”为了和中央工作队唱对台戏，四清后，捏造事实，把石钢炼铁厂搞成“大庆式”企业，以势压人。彭真包庇党内走资派刘拓（通县县委书记）、窦子祥等民愤极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残酷打击中央工作队。中央工作队在通县高各庄搞四清，陈伯达同志联系这个四清点。工作队放手发动群众，斗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窦子祥。贫下中农拍手称快，彭真、刘仁暴跳如雷，大整黑材料，偷偷摸摸送给了刘少奇，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包庇了窦子祥，疯狂地镇压群众运动，攻击坚定的左派陈伯达同志。

四月，彭真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企图搞一个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民国家”的试点，彭真对石景山办事处的指示说：“改造城市政权，北京没有解决，全国也没有解决。怎么管理政权？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怎么消灭城乡差别？总得找出个典型来。城里搞改良主义不好搞了，现在要从石景山开始。把石景山十六万人的生活管得好好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厂除了生产以外，食堂、卫生、房子、副食供应、小孩上学等等，你们统统包下来，要工人称你们是好管家婆。”

五月初，彭真、刘仁带领宋汝棼、余秋里、张洁清、张彭去大庆参观，他们反对我们伟大领袖“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大肆歪曲大庆经验，根本不谈大庆“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起家，抹煞阶级斗争，在北京市工矿、企业、农村，大搞评功摆好，破坏城乡四清运动。党中央毛主席指出这一错误倾向后，彭真又伙同薄一波追查评功摆好的根子，妄图给大庆栽赃，砍倒毛主席树立起来的这面红旗。以后又炮制了京棉二厂、石钢炼铁厂等假大庆式企业，对抗学大庆，为自己脸上贴金。

六月底，彭真抗拒林彪同志的批评，支持罗瑞卿搞大比武。林彪同志批评，军事冲击政治。彭真、罗瑞卿、贺龙等仍然到天津去看大比武，彭真回来还大吹大比武的情况。

九月八日，彭真和赫鲁晓夫一唱一合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说“他（赫秃子）说我们五个人穿一条裤子。今天在座的，那五个人穿一条裤子？我看今天在座的至少一个人穿两条裤子——一条裤衩，一条裤”。又说：“我们喝大锅清水汤，还不是小锅的。我们的汤里至少是有一些菜的，有些别的可以吃的东西。”彭真在政协常委会上公然煽动资产阶级攻击三面红旗，他说：“公社是否可以反对？”“可以反对”，“公社是好制度还是坏制度靠将来历史结论”。

九月八日，彭真为了掩盖他和赫鲁晓夫相互勾结的投降活动，胡说：“赫秃会回头。”彭真向市人代会、政协、五好职工代表会讲话说：“他（赫鲁晓夫），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搞的他没办法，他也会回头的。”

九月八日，彭真吹捧苏修，向苏修投降。他向市人代会、政协会、五好职工代表会上讲话说：“你（赫鲁晓夫）与美国也能合作吗？就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合作。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你赫鲁晓夫怎么样修正主义，尽管赫鲁晓夫这样说，那样说，反正美国与苏联为敌。”彭真颠倒黑白把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吹捧为社会主义国家，把苏修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可耻叛徒、美帝的帮凶，说成是美国的敌人，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掩盖他向苏修投降的丑恶面目。

九月八日，彭真极力美化资产阶级，抹煞资产阶级阴谋复辟的反动本质。他在向全市人代会、政协会、五好职工代表会讲话，说：“为什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他们敲锣打鼓地要求批准公私合营呢？就是他们感到自己搞资本主义是搞不成了。”又说“资产阶级在我国要想复辟，我就不那么相信”。

十月，彭真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对北大一次讲话说：“检查高校六十条发布后一个时期内的学校工作，不必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时还没有提出五反四清，要是这样检查，就检查不完。”

冬天，彭真负责筹备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这届代表名额从第二届的一千二百多人扩大到三千三百多人，增加两倍，彭真乘机大量增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技术界的资产阶级“权威”，演死人戏，洋人戏的“名流”等的代表名额，而相对地缩小工人、农民、解放军的代表名额。这是彭真对我最高权力机关实行“和平演变”，改变其阶级基础的一个罪恶阴谋。选举结果王光美、张洁清等贼妖婆，以及赵燕侠、崔嵬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的“卫道者”都当选了代表。在会上把“后十条”发给全体代表，吹捧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彭真窃踞人大常委第一副委员长，徐冰任政协副主席管常务工作，吴冷西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选为人大常委。

十二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主持讨论通过了“农业十七条”。决议发出之后，毛主席就批评这个决议不好，把文件收回（一九六五年初重新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

主席刚刚批评了他们，第二次会还未召集起来，彭真找李井泉到彭真的家里，从晚上九点谈到第二天早上四点。以后彭真又与刘澜涛在北京饭店密谈，鬼鬼祟祟，极为紧张。

这一年，彭真打击迫害北京友谊公司特艺前门市部王景瑞同志。王景瑞同志向中央写了一封检举信，并揭发了刘少奇的八大罪状。反党黑帮怕得要死，黑帮分子田家英竟批示“对此人造谣，应予追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将王景瑞同志打入精神病院，施行了种种的法西斯暴行。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连同他的总后台完全被揪出后，王景瑞同志才获得了解放。

一九六四年，彭真伙同林枫、陆定一继续包庇杨献珍。当杨献珍抛出“合二而一”谬论，其丑恶面目彻底暴露后，彭真就和林枫、陆定一商量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当作学术问题讨论”。决定“不要扯杨献珍，不许涉及政治问题，不得涉及杨献珍本人进行批判”。当七月十七日中央在报上点名批判杨献珍，在斗争刚开始后的九月二十四日，林枫就传达彭真黑指示说：“首先是自己兴无灭资，自己灭不了，大家帮助你兴无灭资”，“方法用整风方法”。转移斗争目标，结果没有对杨献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就草率收了兵，最后，林枫把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送给彭真，彭真作了多次修改，如把杨献珍是党内

一个“隐患”，改为“脓包”，缩小杨献珍的问题；又如在杨献珍反毛泽东思想一段开头，彭真冠上句话，说杨献珍的错误是“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为杨献珍开脱。

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时候，有一次吴冷西对彭真说：“最近报纸竟是自己骂自己，流传到国外不好。”建议不要在《人民日报》上批判杨献珍。正中彭真下怀，连忙表示：“可以，可以，过些时候，就把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停了吧！”

一九六五年

年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纲领性的文件——二十三条。指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彭真一伙对二十三条恨之入骨，文件还未印好，彭真就迫不及待地从印刷厂要了两份半成品，立即交给郑天翔，让他去搜集在北京发生的“打人、死人、乱斗”等方面的问题，作为攻击二十三条，攻击毛主席的子弹。

二十三条通过后，彭真经过刘少奇同意，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连续作了三个大反二十三条的黑报告。一月二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河北厅的报告会上大讲：“二十三条下达后，打人，死人这股风不煞不行，现在‘非要煞住不可’。还说：‘我是北京的土地爷，不管那个部门叫我们干什么，不管那儿的风，在北京的事都得市委负责，一定得通过我们’，‘工作队是外来货，干部不了解情况，把干部一脚踢开不对’。又说：‘你来整我一下，我整你一下，轮流坐庄还得’，‘互相折台，搞下去要亡国’。污蔑四清是‘找毛病’，把矛头直接指向在北京蹲点的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中央派出的工作队。

一月二十三日，在国际饭店召开的市委扩大会议上，彭真继续攻击中央派出的工作队，别有用心地说：“北京的工作作得好，该管的管了，该顶的顶了”，“乱斗这些问题，是出自中央派出工作队的这些单位”，又说“北京市的干部，大部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没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为北京市的四清定了调子，抵制二十三条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月二十五日，在通县召开了十万人的广播大会，彭真大肆放毒，还代表工作队向“错斗”的干部赔礼道歉，公然煽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有问题的干部翻案，并恶毒地攻击说：“二十三条是否完全正确，也要实践证明。……毛主席也没有先见之明”，疯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彭真为了镇压通县的四清运动，几天以后，就策划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让干部脱离群众和工作队去搞“放包袱”，镇压群众的革命热情，并责令工作组不准再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级干部会结束后，彭真恬不知耻地说：“三天的三级干部会比你们三、四个月成绩都大”，进一步打击了工作队、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二月二十八日、五月四日彭真又两次到通县打击工作队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明目张胆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翻案。他训斥工作队说：“前一段对干部打击报复太多，我都代表工作队赔礼道歉了。你们都不说句话，给你们台阶你们就下嘛！工作队的干部与积极分子应该到被打被斗的干部家里道歉。”他还夸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本事，要给他们“谈心解疙瘩”，“赔礼道歉”，“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

二十三条规定：“经济退赔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彭真对抗说：“有的人可以退，有的人退不起，退赔以后，老婆孩子没饭吃，还得救济他，不如与干部订个合同，生产搞好了，比退赔的还多。退赔的钱每个社员能分多少？”彭真还别有用心地强调生产，抹煞阶级斗争，说：“增产了，就说明四清搞好了，生产上不去，不能说四清搞好了。”彭真一系列的反党黑报告，博得了黑主子刘少奇、邓小平的赏识，大加夸奖。

三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彭真为了进一步破坏城乡四清运动，明目张胆地篡改二十三条，他说：“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顽固不化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造谣说：“顽固不化的坚持”这几个字是毛主席加的，还擅自决定机关、工矿、学校搞四清时，工作队一进点就与干部“三结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竭力推行，一上手就搞“三结合”。市属八个工作团的一百多个单位中，让本单位当权派任队长、副队长的单位占百分之九十七，包庇了不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彭真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伙同陆定一等，继续残酷镇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庇陆平、彭佩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围攻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革命左派，长达七个月之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

在彭真的指挥下，一月底召开了旧市委扩大会议。会上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大行反攻倒算之实。陆平、彭佩云疯狂反扑，彭真为之喝彩，十分赞赏陆平的发言，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陆平写的这么好的文章。”当陆平的反革命言论传到北大后，立即遭到了革命派的愤怒反击。正值陆平绝境之际，一方面彭真出场，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令停止“争论”，另一方面邓小平则亲自出马为陆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撑腰。会后，彭真就布置宋硕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搜集聂元梓同志的“问题”，为进一步镇压革命左派提供子弹。

三月，邓小平、彭真等人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北大社教问题的汇报，当即定的调子说：“陆平是好人犯错误。”事后彭真竟胆大包天地造谣，说是毛主席说的。以后，彭真一伙就更加明目张胆地大搞翻案活动。他们以中央五人小组名义轰赶北大工作组。六月彭真召集北大校系两级干部会议，大肆贩卖黑货，恶毒地攻击毛主席说：“一切人在真理面前都平等，毛主席在真理面前也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要用某种东西封别人嘴。”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胡说什么：“高等学校政治挂帅要落实在教学上”，“政治是灵魂，灵魂是个鬼，要有个躯体”。还更加猖狂地放毒说：“在学校里唯心主义可以讲，蒋介石、赫鲁晓夫都可以讲，希特勒也可以讲”，“蒋介石全集可以出”，“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年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又故意制造舆论，麻痹群众的革命警惕性说：“资产阶级在我国要复辟，我们就不那么相信”，妄图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会上彭真颠倒黑白地给北大社教运动加上了种种罪名，撤掉了工作队长的职务，换上了他们的死党许立群当工作队长，宋硕当副队长，旧市委书记由邓拓主管。把陆平、彭佩云塞进了三结合的班子，并当上了北大社教九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为了镇压北大的社教运动，在彭真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的精心策划下，在民族饭店召开了黑会，但是，他们的反革命伎俩没有压服北大革命派。于是，七月二十九日，在彭真的具体指挥下，又在国际饭店召开了第二次会，疯狂镇压革命派，邓拓、许立群、宋硕、陆平、彭佩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赤膊上阵。他们给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革命派捏造了种种罪

名，戴了许多帽子，组织围攻，轮番作战；他们恶毒地煽动右派翻案，猖狂地进行了反攻倒算。北大一场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被他们镇压下去了。

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继续窃踞国家主席职位，彭真窃踞了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的职务。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趁机大造反革命复辟舆论。彭真和旧中宣部副部长姚漆赤膊上阵，肉麻地吹捧刘少奇，连篇累牍地报道“刘主席”如何如何，胡说什么“刘主席当选，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愿望和共同意志”，故意把刘少奇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说：“毛主席、刘主席是我们最敬爱的领导人。”彭真还精心安排了十万群众到天安门广场载歌载舞，庆贺刘少奇当选，他们疯狂地想把刘少奇捧上天，极力贬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彭真在十八届全国学代会上竟借题发挥地说：“马利诺夫斯基在接见中国参加十月革命的代表团时说‘赫鲁晓夫老了，已经下台了，毛泽东也老了，干嘛不下台’？”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妄图篡党、篡国的狼子野心。

七月三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教育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彭真对毛主席的“七三”指示极端仇视，千方百计进行歪曲，封锁和对抗。首先彭真指使杨尚昆抛出“有关学校师生健康，劳逸结合问题的一个材料”，登在中央办公厅编辑的“资料”上。这个资料打着红旗反红旗，它收集了毛主席和国务院关于劳逸结合和保证学生健康的一些指示，来诋毁毛主席“七三”指示。七月二十八日，在彭真、邓拓授意下，宋硕炮制了一个名为《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在学校中讨论贯彻毛主席对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批示的情况报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欺骗党中央毛主席，否定毛主席“七三”指示的普遍意义。八月，彭真在前团中央书记处召开的社教工作汇报会上，大肆诬蔑群众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是“苛捐杂税太多；乱抓乱管问题很多”，“效果很差”，“疲劳战术”，“实际上是社会强迫，形式主义”等等，百般阻挠和破坏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黑指导下，学校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贯彻“七三”指示为名，大砍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

十二月九日，彭真伙同刘少奇一伙可耻的叛徒，篡改党的历史，借纪念“一二·九”三十周年为名，大力推销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白区工作经验”，为他们阴谋篡党篡国大造舆论。他们大肆吹捧当时还在陕北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的模范”，吹捧当时在监狱中向敌人屈膝投降、出卖同志的大叛徒彭真领导“一二·九”有功，真是荒唐之极！他们盗用中央的名义发通知，让团中央、北京市委宣传部大规模地纪念“一二·九”三十周年。其规模、声势之大，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北京日报》、《前线》、《中国青年报》等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放毒。他们还精心炮制了大毒草《中国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中国青年报社论），全国十六家报纸转载，电台以三十种语言对外广播，流毒全国、全世界。十二月九日这一天，在北京举行了万人纪念大会，彭真、许立群、蒋南翔、陆平等一伙牛鬼蛇神粉墨登场，大放厥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实况向全国全世界广播。北海公园还举办了“一二·九”专题展览。这一系列阴谋活动，都别有用心地宣扬所谓“刘少奇、彭真的功绩”，故意抹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十二月十四日，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在国际饭店的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在党内，真理在谁手里就得听谁的，党要听人意见，不然免不了要栽赃斗”，影射攻击毛主席。又说“在一九六四年人大会上，是主席让我提名林彪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候选人的”，“是我介绍的情况”，介绍过“林彪同志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还是一个有高度修养的马列主义政治家。”别有用心地不提林彪同志是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典范。其目的，一方面故意贬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故意吹嘘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妄图掩盖他一贯反对林彪同志的罪恶勾当。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早在二十五年前，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里，就最明确地提出和最彻底地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疯狂地反对和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疯狂地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即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为他们进行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作舆论准备。

三月间，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召开会议，借口研究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肆无忌惮地攻击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邓小平说：“有不少人不敢写文章了，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基本上好的也不让演。”彭真立即符合说：“学术批判后发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片面性，弄得大家不敢写文章了。”

七月，在刘少奇指示下，彭真把肖望东叫到家里密谋，拟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工作黑纲领：《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九月六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召集彭真、陆定一、周扬、肖望东开黑会，讨论会上，他们猖狂反对毛主席的两次极其重要的指示，极力包庇文艺界的反党黑帮。

为了对抗农业学大寨，彭真指使旧市委炮制了《北京农业大跃进》这株大毒草。在审查这株大毒草时，彭真又借题发挥，恶毒地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有一种人要求别人比马克思还要正确，自己呢？只能装腔作势，有问题也不敢暴露，一旦被人发觉，一触即破。这是坏透了的毛病，用这种态度怎么能团结七亿人呢？”再次审查《北京农业大跃进》，彭真又恶毒攻击毛主席，说：“你想《共产党宣言》不是也修改过几次吗？千万别老是一贯正确，错的东西即使使用红绸子盖着，也是见不得太阳，见不得真刀实枪的。”

与此同时，彭真赤膊上阵反对旧戏革命。九月在一次报告中，攻击京剧改革说：“京剧改革搞的内行不赞成，外行没兴趣，《沙家浜》搞了几个月没有解决现代戏的问题，的确不像个京剧的样子，连手都没处放。”十月，在一次谈话中，又攻击京剧改革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说：“我不承认什么是样板戏，我是五人小组的，我就不知那个戏是样板，要说比较好的还可以，样板要十年，二十年后群众做结论。”

彭真千方百计地破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进行京剧改革。江青同志指定把北京京剧团作为京剧改革的试验田，指出这个剧团不能演旧戏，彭真却指使他的死党李琪写信对抗，这封信彭真亲自修改三次。

十二月，彭真又规定出国的剧团不准演出江青同志亲自导演的《红灯记》。他说：“出

国演出是讲友好，不是宣传革命”。还攻击交响乐《沙家浜》，是“不伦不类，不是一个成功的方向，听了很不舒服”。更为可恶的是，彭真竟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公然让去掉《战洪图》中的毛主席万岁，甚至连共产党员的“共产”二字也不准提。十二月十四日，彭真又叫嚷说：“老戏要演，不演老戏，艺术就保存不下来。演老戏亡不了国，老戏不要演成现代戏，一迷信去掉了，就不成戏了，家乡戏到共产主义也改不了。”

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实行一套封建帮会的、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彭真在旧市委采用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等等卑鄙手段，收买拉拢一帮人，结成死党，充当走狗。彭真参与审阅修改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报告中根本不提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刘少奇还别有用心地加上“基本上称职就可以提拔”。叛徒安子文极力推销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他们对党的宝贵财富、革命的老干部恨之入骨，极尽打击排挤之能事。他们一直鼓吹对老干部要实行“三自一包”（即学习毛主席著作“自由”，过党的组织生活“自由”，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自由”，把生活包下来照顾得好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彭真竟提出把建国以前参加工作所有干部统统“包下来”，经刘少奇同意之后，又起草了文件，妄图把大批老干部赶下台，为他们阴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扫清道路。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彭真伙同刘少奇、邓小平，以安排老干部为名，提出“要在县以上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设委员会，配备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务委员会委员。”妄图建立一个以刘少奇、彭真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庞大独立王国，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叛徒彭真里通外国，在帝修反一小撮敌人面前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敌人屈膝投降，苟且偷生，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前往，按照刘少奇的黑旨意，彭真坚持要去，并亲自起草参加会议的报告。中央严厉批评后，阴谋才未得逞。但彭真还念念不忘投靠苏修，十一月《人民日报》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前两天，他说：“过两天报纸要发表文章了，今天不谈，以后就不好谈了”，急忙召见苏驻华大使拉宾。接见时百般讨好苏修，他还出卖了我国工业布局、三线建设、人口疏散、四清运动情况等大量国家机密。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后，彭真私自接见了日特“商人”（国际情报员），透露了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运载工具的秘密。十二月底，彭真接见一外国使团时，吹捧“法国农业好，很进步。”在帝修反面前充分暴露了彭真反革命、大叛徒的丑恶嘴脸。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视若洪水猛兽，顽固的抗拒，极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年秋天，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作了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并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狡辩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天翔、万里、邓拓等人，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却严加封锁。

十一月十日，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北京各报刊在彭真的控制下，十几天内拒不转载。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上海新华书店发行了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单行本，并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意见定购数字，北京新华书店奉彭真之命，拒不复电。一方面彭真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革命同志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

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另一方面，又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郑天翔、邓拓、李琪、范瑾等多次密谋，对抗姚文元同志的文章。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召开会议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他一进场就问：“吴晗现在怎么样？”大叛徒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又狂妄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极端露骨地反对毛主席。为了抵制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影响，会后，彭真向北京各报刊下令不在同一天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根据彭真授意，精心炮制了一个编者按，最后经彭真定稿。按语中别有用心地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论，煽动牛鬼蛇神攻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

彭真千方百计包庇反共老手吴晗，连续几次召集郑天翔、邓拓、李琪、范瑾等人密谋对策，故意避开吴晗的政治问题，搞所谓纯学术讨论，把历史人物评价、道德继承等问题统统拉进来。彭真指示李琪，在旧市委宣传部编的《文艺战报》上连续出几期增刊，攻击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彭真让大叛徒邓拓化名向阳生在《前线》、旧《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又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琪化名为李东石，在旧《北京日报》发表《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竭力掩盖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妄图把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引入纯学术讨论的邪路。这两株大毒草都是彭真和市委书记处定稿的。在炮制大毒草时，彭真多次大放厥词，辱骂党，攻击左派，包庇吴晗。他恶毒地说：“对任何文章都要一分为二，对姚文元的文章也是如此，吴晗问题的性质不等于敌我问题，不要一批评就紧张的不得了。”他叫嚷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并指示范瑾，《北京日报》要登全国各地报刊各种学术讨论摘要，说“题目多，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现在就是一个字，‘放’。”企图把水搅浑，转移目标。吴晗写了反扑的文章，不敢拿出来，彭真闻讯后，马上让邓拓、范瑾出面给吴晗写信，煽动吴晗反攻倒算。十二月十四日在旧市委工作会议期间，彭真又煽动吴晗坚持反动立场，直接为吴晗撑腰。

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同康生等同志谈话，指出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里官。彭真当时也在场，他胆大包天，公然为吴晗辩护，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竭力掩盖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政治问题。事后，彭真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同他所谓“放”的方针，又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七日，彭真从外地打来长途电话，催着吴晗在《北京日报》上抛出了假检讨真进攻的大毒草《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其反动实质当即被广大革命群众识破，彭真大为恼火，又唱出他那一套资产阶级滥调说：“写文章不要追求调调，要追求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随后，又指示范瑾“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旧《北京日报》立即照办，公开压制革命群众，为吴晗开脱罪责。

十二月三十日彭真召集郑天翔、万里、邓拓等开会指示范瑾利用记者收集情报，并叫郑天翔派人常驻沪、穗、汉、渝、沈等地搞情报，说过去“太闭塞，怎么能作战呢？”一语道破了他的反革命阴谋。

一九六六年

一月二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会上故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在会上公开反对毛主席指示：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仍然强调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并且指责《解放军报》按语“妨碍了放”。

一月九日，彭真批发了《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谈话纪要》，仍然别有用心地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部分。

彭真为了控制局面，指示旧中宣部“阎王”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报刊编辑部负责人开会，拼命地把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拉向“纯学术”讨论上去。还让许立群马上搜集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面对关锋、戚本禹同志攻吴晗《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彭真借口工作忙，没时间审查，故意扣压，不予发表。

二月三日，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会上斗争异常尖锐，康生同志严正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背景来谈。彭真则反其道而行之，在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扬言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他颠倒黑白地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把这个大叛徒、大右派、反革命分子美化成“左派”。

二月初，刘少奇与彭真两家同时搬到玉泉山，密谋多日，在刘少奇的指使下，彭真纠集其死党许立群和姚溱等精心炮制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

二月八日，彭真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系的。在这次汇报过程中，毛主席当面两次质问他：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事后竟敢造谣说：“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紧接着，他就在刘少奇的支持下，滥用职权，对他主持制定的反革命提纲加了一个批语，不经毛主席审阅，就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提纲匆匆忙忙发到全党。事后彭真欺骗上海的同志说，“提纲”是常委会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提纲出笼后，彭真自以为阴谋得逞，得意忘形，吹嘘是“伟大纲领性文件”，真是狂妄已极！

二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召开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彭真在布置召开大会时，却要邀请地富子女和所谓“表现好的地主分子”参加，妄图把这个严肃的阶级组织变成阶级调和的大杂烩。由于广大贫下中农的抵制，没有选出“表现好的地主分子”代表来参加大会。

二月三日，彭真同许立群勾结，盗用中央名义对中南局、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个文件批示，恶毒诬蔑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是

“一些夸夸其谈的空洞报告。”公然提出“不要搞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其中旧北京市委的这个文件是许立群秉承彭真旨意，为了对旧北京市委涂脂抹粉，叫李琪临时凑出来的。

大野心家彭真，不但抓党权、政权，还拼命抓军权，与罗瑞卿等一小撮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狼狈为奸，互相勾结，疯狂地反对和攻击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当罗瑞卿被揪出来后，彭真又百般包庇，负隅顽抗。

三月四日，中央召开工作小组会议批判罗瑞卿。邓小平借故跑到西北，留下黑打手彭真搞阴谋活动。彭真搞了许多清规戒律，千方百计包庇罗瑞卿，恶毒污蔑和攻击林彪同志。彭真限制与会的同志只讲罗瑞卿的问题，不准牵连别人，不准牵连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不准揭发罗瑞卿反对毛主席的罪恶等等。更露骨的是，发言稿要经过工作小组审查（邓小平是小组长，彭真是小组成员）。彭真一伙还恶毒地污蔑林彪同志，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恶毒攻击对罗瑞卿的批判过了头，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三月，日修头子宫本显治来华，彭真、邓小平企图与日修发表投降苏修的“联合声明”，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现加以制止。但彭真还继续勾结宫本，召开欢迎宫本大会，吹嘘宫本在会上兜售的与苏修搞“联合行动”的讲话“很好”。

三月十一日，上海革命同志问旧中宣部：“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叫许立群答复上海同志：“就说是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他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谈到这两点的时候，他怒气冲冲地又责问上海革命同志“党性到哪里去了！”

三月二十五日，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找蒋南翔、邓拓、范瑾、宋硕等开会，研究旧市委简报上刊登的北大法律系考证“海瑞平冤狱”的材料。彭真说，他们这样做，方向对，方法也对，要其他各校都这样做，企图把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引入脱离政治的繁琐考证中去。会上，他们还策划将文科师生一万人轰下乡去，让理工科学生也赶紧下厂去半工半读，以便分散力量，使这些师生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

三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日，毛主席批评彭真主持制定的“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們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同志向彭真详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矢口否认包庇吴晗的罪行，并调兵遣将，负隅顽抗。

四月一日，在彭真的指使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万里召集张文松、李琪、范瑾等人开紧急会议。会上万里传达彭真的指示说，“‘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行，否则更被动”，又说：“对邓拓的本质应有一个认识，他是个好人，但是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会上制定了包庇邓拓的罪恶计划（先在党内搞一个班子，内部批判，然后报告中央，并登《北京工作》，是否公开批判，以后再说），产生了进一步搞反革命活动的组织机构，即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的“市委三人领导小组”和由张文

松、李琪、蒋瑛、宋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

四月三日，彭真在家中召开旧北京市委常委会，会上他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批评，说“坏人不包括邓拓”。

四月五日，彭真在家中又召集刘仁、郑天翔、万里、许立群、范瑾、李琪等八人开会。在会上他喊出了江湖黑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忙。”表白说：“自己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这是因为上学太迟，知道的情况少。”他明目张胆地为邓拓开脱说：“邓拓拥护三面红旗是好的”。还叫嚷：“左派要整风，清理思想。”“不要有什么框框，烧到谁就是谁，不要受任何束缚。”

会上通过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同中央、华北局的假报告。彭真指示说：“责任要写的含糊一点”。他在定稿时将假报告中的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语删去，把“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这个假报告于四月八日上报了党中央和华北局。

四月十日，彭真召集旧北京市委常委会。在会上他被迫承认了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但诡辩说：“主席批评了北京，也批评了其他部门，象这样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妄图减轻自己的罪责。他还顽固地包庇邓拓，胡说什么：“邓拓的问题和吴晗的问题不一样，就是和他搞到一起了，检讨了还可以起来战斗”，“写文章是一回事，拥护三面红旗是另一回事。”并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说，“全国有那么多人，有些人专门看毛病，眼睛比较细，你（指邓拓）恐怕要作准备。”会上，提出对邓拓公开“批判”的问题，他面授了对抗中央的机宜，说对邓拓的“批判”先不提修正主义，看几天再说。

四月十日——十五日，彭真连续召集旧北京市委常委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局级机关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罪行。他还背着中央，把中央关于撤销“汇报提纲”的通知草稿交给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成员传阅，给他们通风报信。

四月十五日，旧北京市委常委会开会讨论“四人办公室”起草的四·一六编者按语，草稿讨论后送到彭真家中，他亲自修改，一边修改一边说：吴晗是反党的，邓拓在抗日战争时打游击，靠几头骡子办报很艰苦，他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应区别对待。他当场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名字排列顺序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并决定第二天见报。他之所以这样决定，原来是第二天他要到中央开会，企图用这个“按语”掩盖他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欺骗中央，欺骗毛主席。

按语定稿后，彭真还亲自打电话给邓拓，要他作好“思想准备”，并给邓拓气说：“改了还可以当文化革命战士。”

四月十六日，旧《北京日报》、《前线》臭名昭著的假批判、真包庇，“害人马，休想帅”的编者按语出笼了。这个编者按语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制造混乱的一个政治大阴谋、大骗局。

四月十六日——二十日，彭真在中央开会，会议期间他仍然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频繁地进行电话联系。向他们泄露会议的机密，并要旧《北京日报》向他汇报。

版面安排情况，重要文章送他审阅，还要李琪找邓拓老婆谈话。他通过电话继续指挥旧北京市委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

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批发了揭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七个文件给旧北京市委全体委员，明确指出要北京揭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接到文件后慌了手脚，在同郑天翔、万里等密谋后，决定召开市委全会（即四月黑会）。

中央严厉批判了彭真，彭真慌了手脚。彭真的老妖婆张洁清紧急召见黑帮头目刘仁、郑天翔、万里，传达彭真的黑指示，叫郑天翔跟上，准备假检讨欺骗中央，对抗毛主席。

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四月黑会”。会议由彭真幕后指挥，刘仁、郑天翔、万里出席，参加会议的四十一人（正式委员三十五人，候补委员六人），会议极为诡密，宣布：不作记录，不出简报，内容不得外传，要严格遵守“纪律”。

会议期间，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贼心不死，继续肉麻地吹捧彭真，疯狂地污蔑和攻击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四月二十七日，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些成员急忙赶到他的家中。这个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仍然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百般地抵赖自己的罪行，胡说什么：“我的错误就是‘提纲’问题，是骄傲自满问题”。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听了以后，四出活动，广为散布，蛊惑人心。

这一天，彭真还施展反革命阴谋，让反革命分子刘仁去“休养”，让反革命分子郑天翔去“蹲点”，以便退居幕后，继续指挥。

五月四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彭真找李琪、张文松、项子明、王汉斌等黑帮，让他们帮助想“问题”，让王汉斌替他写一个假揭发、假检讨的材料，到中央会议上发言，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高炬、何明同志的文章，打响了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第一炮。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被揭发以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慌了手脚，为了保存自己，包庇他们的反革命干将，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急忙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旧市委机关派出工作组。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通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一伟大的历史文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共产党宣言”，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问题。它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象一把犀利的匕首，戳穿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后台刘少奇、邓小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阴谋，象一面无产阶级照妖镜，暴露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及其同党的丑恶嘴脸。它宣判了这群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的死刑。它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进军号，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